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歌者在天堂，生者在地獄

納粹這場戲，通脹是導演

帝國與自由主義的相互依存

“屌絲”的芥川獎

姜燁城事

調和者蔣介石

—— 陶涵訪談

布達佩斯訪“恐怖屋博物館”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执行编辑

苏小和 王晓渔 成 庆 言 一
夏佑至 扬 克 孙骁骥 灵 子

轮值编辑

成 庆

观察员

文学: 朱 白(广州) 朱航满(石家庄)
经济: 苏小和(北京)
思想: 成 庆(上海)
文史: 王晓渔(上海)

特约撰稿人

戴新伟(广州) 刘 柠(北京)
夏佑至(上海) 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
凌 越(广州) 孙骁骥(北京)
贾 葭(香港) 罗四鸽(美国·波士顿)
孙传钊(上海) 扬 克(德国·图宾根)
灵 子(北京) 燕 舞(北京)
吴 强(北京) 言 一(成都)

翻译

朱芳艺(美国·孟菲斯)

设计

刘承周

2012年9月 第6卷第7期

总第58期

致力于 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

细则

○ 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 撰写过程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 观点尊重个人趣味, 不求客观统一。

○ 独立阅读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 赠书将自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 对于相关部分, 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 独立阅读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 将选登部分批评类读者来信, 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的批评。

○ 独立阅读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 但谢绝出版从业人员参与, 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份, 连续三期撰写阅读报告将列入观察员名单, 连续三期没有撰写视为自动退出; 一年内在“独立阅读”发表三篇及以上文章者列入特约撰稿人名单, 否则视为自动退出。

○ 独立阅读欢迎订阅, 凡订阅者将成为独立阅读的定向发行对象, 在第一时间与独立阅读观察员、特约撰稿人共享阅读成果, 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订阅事宜, 烦请发信至shrbooks@gmail.com。

更多即时信息:

<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

以往各期“独立阅读”均可在以下地址下载:

<http://iask.sina.com.cn/u/1682295802/ish?uid=1682295802>

“独立阅读”的微博地址为:

<http://weibo.com/1819737225>

欢迎各位关注。



法国思想家卢梭曾经嘲讽英国的选举代表制，认为英国的自由只存于选举之日。卢梭贬低英国代表制，无非是想凸显其“人民主权论”。不过在某些国家，似乎连选举日也并不存在任何自由，反倒多了一些不自由。更饶有意味的是，那往往还是在人民主权的名义下所进行的代表选举制。如何解释这样的悖谬，相信卢梭先哲起九泉之上，也难以高妙的哲理去妥当地诠释。

“荒谬”是后极权社会的最常见情绪，但荒谬感往往会演化为常识，然后嵌入每个人的心中。要想避免“荒谬的常识感”，或许需要不断的警醒与反省，检查我们的内心是否丧失对“苦难”的感受，对“不公平”的触觉。因为在荒谬的情绪包围中，人心会不断的麻木，乃至僵化，今日社会问题的种种苦难相貌，其实与人心的僵硬有密切的关系。

救世需救人心，但人心如何救拔，恐怕又是仁者见仁的老问题，但无论如何，对于修缮人心而言，阅读显然是一条值得坚持的道路。



目录

封面用图

Christ of ST John of the Cross
Salvador Dali



阅读报告 中国大陆

文学 • 戴新伟
文学 • 灵子
文史 • 王晓渔

005-017

阅读报告 台港海外

文学 • 罗四鸽

018-021

书评

• 朱白
歌者在天堂, 生者在地狱

• 孙晓骥
纳粹这场戏, 通胀是导演

• 吴强
帝国与自由主义的相互依存

022-036

随笔

• 刘柠
“屌丝”的芥川奖

037-041

电影

• 言一
姜烨城事

042-044

访谈

• 罗四鸽
调和者蒋介石
—— 陶涵访谈

045-055

游历

• 邵浴日
布达佩斯访“恐怖屋博物馆”

056-068

观察员 戴新伟 (广州, Daypessoa1935@gmail.com)

星期六早上刷微博，刷出一条新闻：11月2日，韩素音在瑞士洛桑家中去世，终年96岁。很容易就找到了她的自传三部曲之《无鸟的夏天》，这是三联书店在1981年出版的小32开，精致素雅，当年同另外两部自传《伤残的树》、《凋谢的花朵》得自成都旧书店，一直带在身边——除了装帧可爱、文章值得重读，大概也有韩素音家世的原因。看过《伤残的树》的读者都知道，韩素音的父亲周映彤是四川第一代留学生，周家是郫县大族，周映彤回国之后是铁路工程师，他的妻子是比利时贵族；无疑地，我对周映彤这一代的杰出人物——比如留法的李劫人，留日的吴虞——很感兴趣：不仅要看他们在革命大潮中的表现与作用，也有必要长远地看待他们。作为留学生，他们都会先在自己家族内部引起改变，继而通过自己以及家人、后人，影响一个地域。我长久地记得弘一法师回忆他的留日同学、成都一位姓曾的话剧界人士，因为后来他再没有听到其消息，遂有寂寂无闻之感。但这样的新式人物在当时当地，是不可能没有影响的，看吴虞的日记也可推断一二。所以当我读到更为条理、更有故事性的韩素音三部曲，就不得不为辛亥、民国间的故事所激动了。就在我生活过的地方，有过如此繁复跌宕的人生。这种惊奇，大概正是历史吸引我们的原



因之一。而读者如我，又正好成长于这块盆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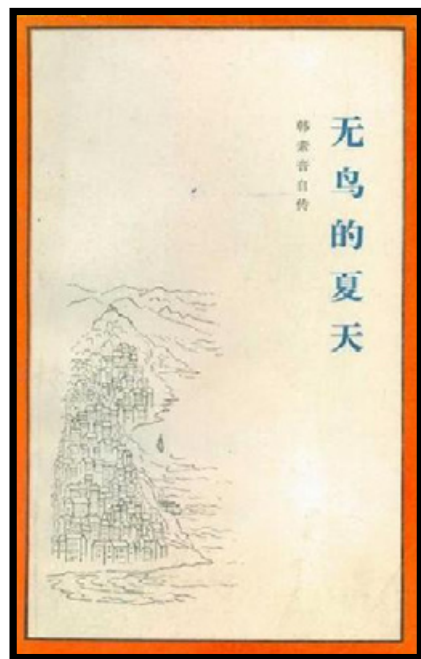
从若干有关韩素音的微博消息中，我又得知，她生于河南，而周氏家族是客家人，所以祖籍在广东。她的堂弟、著名物理学家周光地接受了媒体记者的采访。而顺手在《无鸟的夏天》中翻到的，正是1946年

韩素音在英国期间，她的三叔（在《伤残的树》里面亦有“出镜”）把两个儿子送出国，其中四弟就是周光地。他来到伦敦，在一所理工学院读书。某一天，正是周光地给韩素音带来了她的丈夫唐保黄战死东北的消息。作为国民党高级官员，唐保黄自然是与共产党作战；当时韩素音与丈夫感情破裂，也因为国际局势的瞬息变化，她没有回到中国参加丈夫的葬礼。

当然，最值得一说的微博消息，还是韩素音的这三部自传以及自传体小说《瑰宝》近年都有重版，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看看。我在一边刷微博一边重读《无鸟的夏天》时又发现，有关她丈夫的死，她的朋友芸玲从台湾来信，“说法最骇人听闻”，说“这些共党是残暴的野兽”，“他们杀人的方法残忍得令人难以置信”，也就是代表台湾方面给韩素音做“统战工作”。而众所周知，韩素音是亲共产党的。就在同一页（P268），有这样一段：

“一九五八年，我在北京和我的朋友龚澎提起上述这种种说法，一方面是怀着悔恨的心情回溯以往，一方面也希望能最终确切地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龚澎对此却一句话也没讲。”

中共高干龚澎是韩素音的燕大同学，在两个阵营之间的韩素音耐人寻味，但绝非简单而平面的“亲共”或者“左派”。如果



不注意历史的幽微之处，又谈何知人论世？就像韩素音引西哲所说的，“人而无知一己民族的历史，终将在劫难逃”。

这次重读《无鸟的夏天》，她所写的1945年夏天在英国威尔特郡乡村的生活尤其令人喜欢：

“由于骑车累了，我躺在茂盛的草地上歇息——英国的乡村真美呵！它是如此丰饶，如此安谧，一切都那样美妙，那样深邃……成群的轰炸机时常在这夏日的天空中飞来飞去……一枚V-1火箭从我头顶上呼啸而过。但是，柔软恬静的大地对此却毫不在意。我们一边用手遮着眼睛向上看，一边嚼着三明治，既不愤怒，也不害怕。”

我一下子懂了十多年前读詹姆斯·希尔顿《偶然的收获》里，一帮子人在庄园里驾车的对话。那也是在大战胜利之后，他们谈论的其实是一股久违的生活：庄重的、固定的生活方式。只要你读过其中任何一本，我想都会对何为变动的、浮躁的、焦虑的生活有所察觉。

1997年夏天，我第一次读到了王小波，其时他已经因心脏病去世。我是想说明作为受过王小波影响的读者之一（很显然，这个读者群相当的庞大），而每个这样的读者都有其自己与王小波相遇的经历。

《我的兄弟王小波》（王小平，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5月）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并不仅仅是因为这是王小波的哥哥所写、且王小波占了很多的篇幅。有一点应该一提，特别是对尚未阅读此书的读者：此书最早的名字叫《兄弟》，很显然，有兄有弟，是两个人的故事，而不是“回忆小波”、“我所知道的小波”这样庸俗煽情的故事。虽然，王小平所说的对弟弟早年内心世界的把握、两人的内心结构近似、并且由自己童年的情绪活动来反射小波的童年等等说法无不令人怀疑之处，但关注叙述者，始终是读这本书值得留意的。我们有必要去了解王小波的背景，成长、经历、各种思想的发轫。这不同于从王小波的作品来了解。

王小平以小主题的形式，一篇篇写王家的故事：来自四川的逻辑学家同时又是党的干部的父亲，来自山东老区同样是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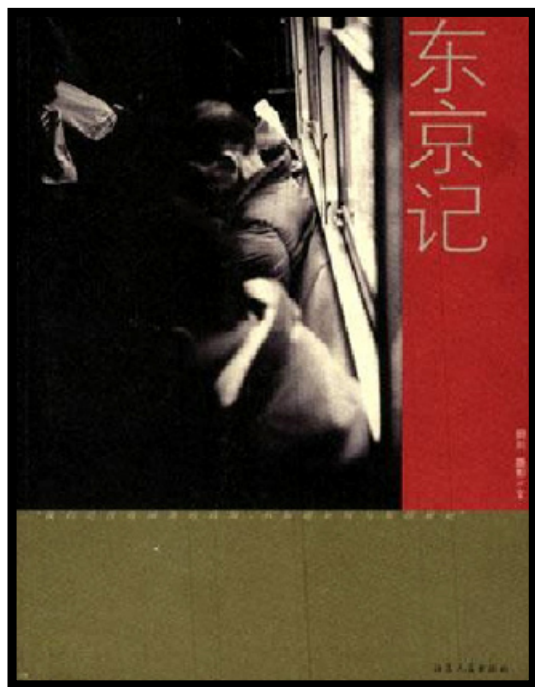
部的母亲，姥姥，一大堆小孩，家里从城里教育部搬到郊区人民大学等等，还有父亲的政治生命浮沉，兄弟三个上山下乡的经历。现在，我们读到的关于1949年之后的个人叙述越来越多，包括像北岛等人在北京四中的集体回忆等等。但个人回忆就在于，个体不同，经验不同，采取的回忆方式也不同，这种不同总会让你惊喜地读出历史细节的丰富。《我的兄弟王小波》中关于这方面的记忆很多，比如从王小平与王小波写诗折射出全民作诗的年代，而一家小孩子步行郊游圆明园的经历，则是折射出1949年后相对平和的几年，等到文化革命的战火燃起来，就见识了人大校园里的武斗。“文革”中的故事永远是超过后来读者的想像的。私人记忆永远是跟历史联系在一起的，往往又在丰富后者。简单来说，王小平的故事，其实无所谓点不点明要去把握王小波的世界，这事实上也是跟王小波紧密相关的记忆。它甚至包容得更大，而不仅仅是关于王小波的回忆——有必要回想一下，在王小波笔下的“我哥哥说”。王小平是哲学专业出身，行文之间往往充满了奇思妙想，简单而又深刻的解说了他与弟弟的故事。

初读王小波就知道他对查良铮先生译普希金的推崇，“我爱你，彼得兴建的城堡”。王小平披露了这一“诗学熏陶”的来源，点明了王小波的文字缘份，书里说到，王小波自承有文字廉耻观。王小平的诗歌也写得不错，附录收录了他的古体诗和现

代诗，质量足以证明兄弟俩的文学品格之高。最重要的，是书中并没有太多要去解释王小波的重大节点什么的，反而是像一幕电影，该他出场的时候他就出场，而没有他的时候照样有人在演出。如果说有什么让人特别感动的话，就是王小平的回忆里以自己、也包括王小波的经历说明了一点：在俗世里除了庸常的、实用的东西之外，人不能放弃对形而上对精神世界的追求，这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显得重要，在今天同样如此。

许久没有重逢过日本的某种东西了，尽管几乎每天都要与日本相关者发生关系：从电视、网络上的新闻到现实生活的日用品，甚至街上的日系车——开个玩笑。事实就是如此，只要你去了解，便会觉得事物并非如想像的单一。何谓日本的某种东西呢？我久久记得日本演员仲代达矢为美国人Audie Bock女士所写的Japanese Film Directors一书作前言，谈到他合作过的导演们，“抑郁不欢如成濑，爽朗如木下惠介……”日本导演成濑巳喜男足以代表这样的东西，是一种远远比精细的、雅致的、完美的日本物事更深入的东西，深入意味着真实，而真实往往是不讨人喜欢的。

非常偶然读到田川的《东京记》（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用所谓检察官式的评判，是有股灰色，不明朗的，不健康的——但是谁有权力去要求别人的故事一定要光明呢？检察官不能，读者也不能。田川写的是自己作为留学生在日本的经



历——或者说遭遇，在东京打工的人与事，先是在饭店，后来是分派报纸。留学故事，感情占了大宗，还有小部分是经历琐记，浮光掠影居多。田川是摄影师，他的文章都很短，像一张照片而已，但在有限的字数里，将人与人之间、特别是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以及在日本的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碰撞简洁有力地写出来了。那些不友好的，不和善的，可能是日常生活常态的东西，他都写出来了。正因为他写得短，所以恕我无法引述，加以介绍，一个直观的评判是，田川写的，要比我们读到的大部分关于日本的随笔文章真实：那是一个血肉之躯所经历的种种反应，而不是在书本与历史之间梳爬得出的结论。

用所谓借鉴的说法，就因为这样个案式的书写，我觉得远远胜于那些以了解日本为目标的著作。它可以让读者立刻丢掉不必要的幻想去认识一个国家。

《东京记》分为“杂人”和“杂事”两部分，前者写的就是在饭店打工和分发报纸的经历，而以所见的各种人物串联起来。我非常喜欢这部分，简洁，直接，真正的写出了留学生的生活，特别是这些人都是有故事的。恰如我们的人生一样，你要讲述值得讲述的，必然要舍弃很多无用的、乏味的

东西，“杂人”恰是如此，田川选择性地写他们的故事，也是滤掉了许多，这些我们可以凭借一角冰山去想像。我的一个感觉是，

“杂人”所写的十八篇人物，既是十八个人物速记，也是十八篇短篇小说，并且相互有机地构成了一部短篇小说集。这位摄影家相当克制，叙述冷静，但在《小萍姐》这篇我们又好像看到了一个地下潮流的入口，某种压抑至深的情怀，尽管掩饰得很好。相比之下，《杂事》则是规矩的日本见闻记，和其他的异国见闻相差不多。Q

特约观察员 灵子（北京，liufang0815@gmail.com）

中国作家最为西方世界所知的，或者保险点说，至少最为诺奖委员会所知的，正是乡土文学。这应了龙应台给莫言的贺词：最泥土的人最国际。

这种状况，与诺奖终身评委、瑞典汉学家马悦然一直不遗余力的译介有关。

马悦然最钦佩的中国作家是“中国乡土文学之父”沈从文，1987年就将《边城》翻译为瑞典文出版。1998年沈从文去世让他特别惋惜，他多次公开表示，当年如果沈从文健在，一定会获得诺贝尔奖。他甚至为此多年力争，希望说服诺奖评委会能颁奖给已去世的作家。

在当世的中国作家里，马悦然最欣赏莫言、李锐、曹乃谦。他们一个比一个乡土，一个比一个纯粹，甚至也与此成比例的，在国内一个比一个名气小。他们的小说，从题材到语言，都带着北方土地的浓烈气息。尤其曹乃谦，整个语言体系就是彻彻底底把雁北农村的方言搬上了纸面。马悦然2004年翻译他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时，几乎每天一封邮件问书中各种词句的含义，单单来往书信后来结集成了《温家窑风景三地书》。

可以说，是马悦然把曹乃谦领进了世界文学——用马悦然常说的话，世界文学就是翻译；而此前将曹乃谦引入中国文坛



的，则是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这之间说不上什么代际、谱系，但个中巧合也隐约透出乡土文学走向世界的脉络。

1986年，汪曾祺随《北京文学》杂志社组织的创作班来大同开会，碰上37岁的大同警察曹乃谦前来投稿。汪曾祺一口气读完这篇题为《温家窑风景五题》的小说，脱口叫“好！”更让他惊讶的是，这只是曹乃谦的第三篇小说。

那年之前，除了刑侦报告，曹乃谦什么也没写过。有朋友到他家做客，对他满书架的外国名著颇为不屑，说，书不少，但有一个作家的书你肯定没有。曹乃谦问哪一个。朋友说，曹乃谦。曹乃谦愣了一下，那我就写篇小说叫你看看。朋友说，写出不算，发表才算。于是两人打赌，以半年为期。花了三个月时间，曹乃谦写出处女作《佛的孤独》，两万多字，又三个月后发表在大同文学杂志《云冈》上。朋友说本地杂志不算，他这才打听到《北京文学》。

汪曾祺建议把这篇小说题目改为《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出自小说中主人公唱的“麻烦调”（指要饭的人唱的歌）：“白天想你墙头爬，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小说发表在《北京文学》1986年第6期，配发了汪曾祺的专评。曹乃谦受到极大的鼓励，从此转为自觉写作。

为了解国内当代文学的状况，曹乃谦买来《收获》《当代》《小说选刊》等文学期刊仔细阅读，至今记得当时让他印象深刻的作家名字，刘恒、刘震云、李锐、王安忆、铁凝、史铁生、肖亦农……“大概集中看了两年，觉着自己跟他们水平差不多，放心了，就不看了。”

1991年，曹乃谦由汪曾祺介绍加入中国作协。会员证到手，他高兴得马上印了个名片。

两年后，马悦然偶然在山西文学杂志上发现曹乃谦的短篇，如获至宝，主动翻译



为瑞典文，并写信到山西作协，辗转与曹乃谦取得联系。在马悦然十几年来来的推崇与译介下，如今已有媒体将这个此前在国内默默无闻的作家称为“中国最有可能的下一位诺奖得主”。

借着今年诺奖的热乎气，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山西作家曹乃谦的作品六种，《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佛的孤独》《换梅》《最后的村庄》《你变成狐子我变成狼》《温家窑风景三地书》，囊括他从小说、随笔到书信、日记等几乎所有作品。

短句、方言、重复，是曹乃谦文字的典型风格，汪曾祺称这语言带着股“莜面味儿”：

那只蛾儿飞进黑处看不见了。老柱柱又掉转头看这另外一只。这只蛾儿还在扑灯。越扑越起劲，就像是要跟灯拼命呀。

有啥瘾，非要不顾死活地扑。老柱柱想。

有啥瘾，非扑，非扑。老柱柱想。

唉——我看出了。这人活一世，男人就是那没出息的蛾儿，女人就是这要命的灯。男人扑来扑去扑女人，可临完还不是个往火坑坑跳？老柱柱想。

那还不是个这？就是个这。老柱柱想。

（《男人》）

天大的事情在这种简单有力的描述里面都被凝练成两类：食与性。曹乃谦笔下温家窑的男女，不是想办法偷一口粮，就是想办法“做那个啥”，再或者是为了偷一口粮而“做那个啥”。至于那些个新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的风波，除了偶尔出现的“群专”（“群众专政委员会”，“文革”时期各级政府维护治安的组织），于此几乎毫无踪影；尽管，他的故事主要发生在1973、1974年。似乎在温家窑这贫瘠的环境里，日子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就是个这”。

“烙饼就滚水吃饱了。她又把衣服脱光说：‘来哇。穷人就这点福跟富人是一样的。’”（《贼》）

这里的男女老少个个欲望旺盛，无论

对粮食、钱还是性。然而匮乏永远是常态；或者正因匮乏，才使得欲望如此旺盛。偷情、朋锅（两个男人共用一个媳妇）在村人看来稀松平常；秋收的时候，女人们晚上去找给公家看地的光棍儿们，她们的男人白天就可以大模大样从地里往家背粮食；有的光棍儿一辈子娶不上媳妇，喝多了就在炕上俩男人搂着亲嘴，“嘴唇吸得滋滋响”，甚至憋到没办法强奸自己的妹妹、母亲……

汪曾祺曾评价曹乃谦的小说“贯穿了一个痛苦的思想：无可奈何。对这样的生活真是‘没办法’”。

但这封闭、无望、充满赤裸欲望的世界里，也有闪光的品格和纯粹的感情，简短的对话里常藏着弦外之音，让读者冷不丁就被打上一下：

“有钱我也不花，悄悄儿攒上给丑哥娶女人。”

“我不要。”

“我要攒。”

“我不要。”

“你要要。”（《莜麦秸窝里》）

曹乃谦自称，他的每一篇故事都是真实的，每一个人都有原型可依。中篇《换梅》便直接取材于自己养母的故事。

1949年，七个月大的曹乃谦被渴望孩子已久的养母偷走，用毛巾拴在毛驴肚下，

从应县下马峪村一直跑到一百八十里外的大同市。找不到因从事地下工作而改名换姓的丈夫，养母只好带着婴儿要饭为生。年过六十的曹乃谦至今提到养母仍会哽咽，他说这是自己一生中第一位大“贵人”，“如果不是她，我现在还是个农民，顶多是个农民企业家。”

然而，即便婴儿时就完成“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曹乃谦最痴迷的仍是农村，喜欢盘腿坐在床上扒着被窝写字，下雨时虽然住楼房也总抬头看房顶是否漏水，偶尔来上海，怕迷路而不敢轻易拐弯。马悦然称他是“一个真正的乡巴佬”。

这样一位纯粹的乡土作家，确实不易（也不必）去写时下混乱、易变的生活。曹乃谦曾说：“当下的事情，我总是看不清楚想不明白……想写，写不来。”莫言也曾坦诚，“我截止到现在还是在吃老本”，“每一个母题都是从过去的经验里来的”。

当下社会太难把握，想写而写不来，于是退守到故乡，也算是一种“无可奈何”。这种无奈，恐怕不独作家有之。

在当下中国，现实中层出不穷的离奇荒谬，已远远超过了文学中穷尽想象力的“魔幻现实主义”。也因此，人们早已不倚赖文学来了解、洞察这个社会——这恰是在大多数成熟、稳定的社会，文学所承担的功用之一。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杰作，无一不在此列。在中国，文学也曾起到这样的功用，远的不说，上世纪70年代的“伤



痕文学”、80年代的“寻根文学”“先锋小说”，就将当时社会思潮中最重要、最新锐的部分反映出来。然而今天，现实分裂与异变的速度远大于作家创作的速度，文学只能亦步亦趋跟在身后，更多时候，人们（包括作家们）都只能依赖新闻报道和微博了解世事了。

台湾作家朱天心也遇到过类似的难题。她曾经有一个长篇计划，想用列传的形式写台湾的一代人。开列的二三十个人名里，绝大部分是政治人物，比如陈水扁，她

想把他从“神坛”上拉下来。可是还没等她写完，陈水扁已经成了过街老鼠。本来下笔的动力是告诉别人他不是那么好，结果却好像反过来，变成要说他其实也没有那么不堪……这中间的荒谬感，恐怕没有人能比作家体会更深。

大陆社会相比之下更加复杂、多变。若想把当下中国的面貌描摹出来，难度不可谓不大。尤其是位于文坛顶端的“五零后”作家们，以莫言、王安忆为典型代表，几乎无一例外都退回到自己年轻时的乡土记忆，而不是直面他们长期处身的现代城市，这多少让人感到失望，但也客观反映出如今文学映照现实之棘手程度。

当然，直面城市或回到乡土，两种面向并无高下之分；文学自有其自由，无论哪种写法，于最高处都可窥见美或真相。只是，如果一个时代的创作者们大都走上同一条

道路，就让人忍不住想问个为什么了。

在台湾，纵然社会变化太快，“五零后”的作家如朱家姐妹、张大春、舞鹤，以及“六零后”的骆以军等人，还是兢兢业业书写着当下，解剖自己所在的阶层和生活，《巫言》《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四喜忧国》《西夏旅馆》等作品颇有成绩。相形之下，大陆却少有成功尝试。对此，台湾书评人唐诺提供过一种解释：台湾面积太狭小，现代化如同原子弹爆炸一样炸平了所有地方，没有一个角落可以躲闪。没有隔绝也就没有了独特，文学无处可逃，不得不面对城市化。而大陆的幸福或者说是问题在于，尚有地方可退。城市化虽发展迅猛，但天南海北有的是隐秘所在，莫言有充满传说的高密，王安忆有时间缓慢的水乡，大家还可以歇歇脚，喘一口气。

但愿果真如此。Q

观察员 王晓渔（上海，wangxiaoyu1978@sina.com）

2012年2月，波兰诗人希姆博尔斯卡逝世。她的意大利版诗歌选集《写作之乐》竟然占据意大利畅销书榜榜首四周，一个月内卖出了6.4万册。（《中华读书报》2012年5月9日）看到这则消息，我特意查了一下意大利的人口，是6000万左右。按照这个比例，这本诗集要在中国卖出130万册以上，两国才算持平。显然，这是不可能的。这篇报道介绍完意大利的销量，接着说了一句：“可惜的是，在中国，希姆博尔斯卡几乎没有什么读者。”

辛波斯卡（即希姆博尔斯卡）的《万事静默如谜》（陈黎、张芬龄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8月）终于进入内地，据说销售状况还不错。但在中国，一本诗集销量“不错”的标准，大概是6400册，如果能达到6.4万册，

这个译本最初以《辛波丝卡诗选》（台北：桂冠出版公司，1998年）的名字出现，闻名已久，未曾得见，此次一遂心愿。译者之一陈黎是台湾诗人，他悼念二二八事件的《二月》——“失踪的秋天的日历/失踪的春天的日历”——多年以前读过，每逢春夏之交都会想起。

辛波斯卡写过一段主旋律诗歌，斯大林死后，她开始反思，逐渐放弃宏大叙事和宏大抒情。辛波斯卡没有进行控诉，那



很容易重新踏入宏大叙事和宏大抒情的河流，她也没有宣布文学和政治无关，在一个极权国家，这种“无关论”本身就是极权的产物。辛波斯卡返回到日常生活的多样性、偶然性和荒诞性，在这种书写面前，历史必然性的铁律显得有些脆弱。

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同样是一位通过诗歌表达反对但没有把反对当做诗歌的写作者。继《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阿多尼斯诗选》（薛庆国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3月）之后，《在意义天际的写作：阿多尼斯文选》（薛庆国等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9月）也于近日出版，堪称合璧。

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和美国诗人布

莱的通信《航空信》(万之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10月),是期待中的书籍。2011年,特朗斯特罗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南方周末》(2011年10月13日)刊登过1970年4月的一封通信(李笠译),特朗斯特罗默讲述了怪诞的访苏见闻:在拉脱维亚,他因为这么一句“我们冰川时期/画室的红色野兽”被视为危险的政治诗人;每天晚上都有人打电话,他一拿起电话,对方就挂——讲到爱沙尼亚人更热衷于入党、晋升、掌权,诗人这样评点:“与其说他们勇敢,不如说是更现实。”

有些意外的是,这封信透露,在一个讲拉脱维亚语不超过200万人的国家,特朗斯特罗默和另外两位瑞典诗人的拉脱维亚语诗集,竟然在一个星期卖出了3万册。我又忍不住计算了一下,按照这个比例,相当于在中国卖出了2000万册——难道是特朗斯特罗默笔误,把诗集销量写错了?

《航空信》收录了两位诗人1964年至1990年的通信,不仅有精细的诗学讨论,臧否人物,还能通过两位诗人观看正在发生的历史,比如布莱在1967年2月的信中称桑塔格是“这个世界上最令人讨厌的人”、“(纠缠不清的)枯燥无味的地狱的代表”,称专业的左派追随者对越南战争“没写过或者说出过任何值得被人记住的话”。由于是私人通信,这种随意而有趣的片段随处可见。

虽然诗集在中国的销售不容乐观,最

近却陆续有几套诗集前仆后继地问世:一套是花城出版社的“名著名译诗丛”,一套是湖南文艺出版社的“诗苑译林”,一套是重庆大学出版社的“新陆诗丛·外国卷”,一套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英诗经典名家名译”。

“名著名译诗丛”包括惠特曼的《鼓声》(屠岸译)、洛尔迦的《洛尔迦的诗》(戴望舒、陈实译)、维尔哈伦的《原野与城市》(艾青、燕汉生译)、奥维德的《爱经》(戴望舒译)、海涅的《海涅的抒情》(冯至译)、普希金的《我记得那美妙的瞬间》(戈宝权译)。

大学时代,在图书馆翻看“小白桦诗库”(外国文学出版社,1991年)的情形历历在目。当时除了叶赛宁和帕斯捷尔纳克,对其他诗人几乎一无所知,更不知道“白银时代”,对很多名字的熟识都是从“小白桦诗库”开始。

这套丛书共有十种:《一切始于爱情: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诗选》(谷羽译)、《二十世纪独白:沃兹涅先斯基诗选》(李海译)、《人:梅热拉伊蒂斯抒情诗集》(孙玮译)、《婚礼:叶夫图申科诗选》(苏杭译)、《当今世界:古米廖夫诗选》(李海译)、《爱:阿赫马托娃诗选》(乌兰汗译)、《生活——我的姐妹:帕斯捷尔纳克诗选》(刘伦振、曾正平译)、《白桦:叶塞宁诗选》(郑铮译)、《致一百年以后的你:茨维塔耶娃诗选》(苏杭译)、《贝壳:曼德尔施塔

姆诗选》(智量译)。

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致一百年以后的你：茨维塔耶娃诗选》，花城出版社再版了《贝壳：曼德尔施塔姆诗选》、《双子星座：帕斯捷尔纳克诗选》，可惜其余几种未见重印。

“诗苑译林”重出江湖，必须奔走相告，这套诗集在80年代闻名一时，此次第一辑五种是：《爱伦·坡诗集》(曹明伦译)、《叶芝诗选》(袁可嘉译)、《狄兰·托马斯诗选》(韦白译)、《图像与花朵》(波德莱尔、里尔克著，陈敬容译)、《拜伦诗选》(杨德豫译)。

“新陆诗丛·外国卷”是河北教育出版社“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的续集，此次出版六种：《卡瓦菲斯诗集》(黄灿然译)、《法国现代诗抄》(徐知免译)、《诺瓦利斯作品选集》(林克译)、《贝恩诗选》(贺骥译)、《拉斯克-许勒诗选》(谢芳译)、《R.S.托马斯诗选：1945-1990》(程佳译)。这些诗集有的并非第一次出版，《卡瓦菲斯诗集》曾收入“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此次是修订再版，《法国现代诗抄》曾以《雨：现代法国诗抄》(外国文学出版社，1989年)为题出版，此次也是修订再版，《诺瓦利斯作品选集》与《夜颂中的革命与

宗教：诺瓦利斯选集卷一》(华夏出版社，2007年)有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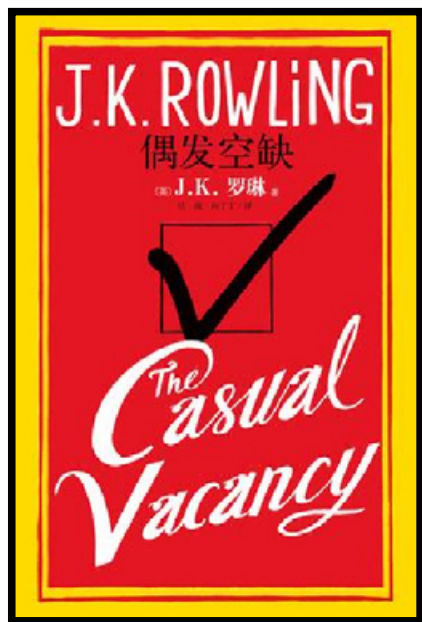
“英诗经典名家名译”有十一种，均为英汉对照：《布莱克诗选》(袁可嘉译)、《叶芝诗选》(袁可嘉译)、《济慈诗选》(屠岸译)、《弗罗斯特诗选》(江枫译)、《拜伦诗选》(杨德豫译)、《纪伯伦诗选》(冰心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屠岸译)、《狄金森诗选》(江枫译)、《雪莱诗选》(江枫译)、《彭斯诗选》(王佐良译)、《华兹华斯诗选》(杨德豫译)。只是这套书由李肇星撰写总序，多此一举。Q



特约观察员 罗四翎 (美国·波士顿, luosiling@gmail.com)

近“非常成人,但好吗?”自9月27日,J.K.罗琳在“哈利·波特”系列后的首部小说《偶发空缺》(任战 向丁丁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10月)英文版全球同步发行后,这部成人小说也与每一部哈利波特一样,再次刮起“罗琳飓风”,各方评论如潮,但大多持质疑态度:够成人,但好吗?最早出现的一些评论,归结一点便是:对不起,如果你想把高高的期望持续的久一些,就不要去看。大多数评论都只给出一些无力的表扬,有的甚至只有咒骂。

《纽约时报》的头牌书评人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说,她允承认“小说有许多真实的故事片段和随处可见的幽默”,但她的结论是:“这本书失去了魔力——从巫术角度说,或是从叙述角度说。”实际上,在她看来,看《偶发空缺》引发的情感与哈利波特系列引发的情感完全相反,“人性的虚弱、自私和饶舌的愚蠢交杂的令人沮丧的情感”,而不再赞美人类的“勇气、坚韧、忠诚和责任。”雪莉·康奈利在《纽约每日新闻》上回应了这种感觉,“J.K.罗琳从波特(Potter)变成了大便嘴(potty-mouth)”。她认为这本书“不可怕,只是无聊(dull)。”而西奥·托特在《卫报》上的评价是:“所有的人物都非常可怕或是悲惨地自取灭亡或是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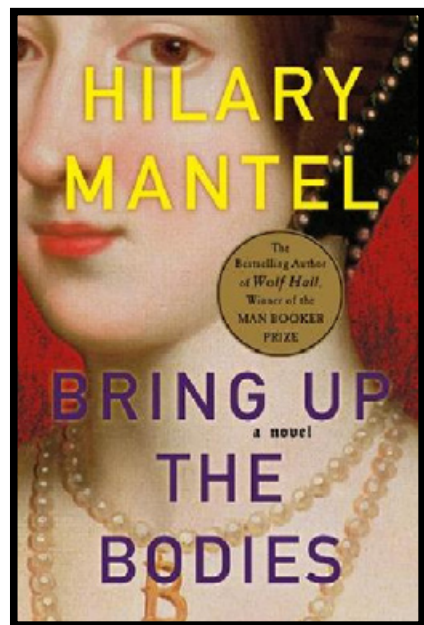


大卫·厄尔林在《洛杉矶时报》上撰文说:“罗琳……只是‘偶然’对她的人物残忍,让他们面对他们无法穿越的困难,然后把他们的生活从坏变得更坏。”不过,莫妮卡·海塞则在《华盛顿邮报》上宣称,《偶发空缺》有“一定魅力”,并赞扬罗琳“迅速抵达人物内心的敏捷表达,同时还能对其进行评论的能力。”《娱乐周刊》也持此态度,“罗琳做的不错,愉悦地轻叩着一把令人吃惊的尖锐而有趣的刀刃,将她20多位人物的无尽的虚荣和弱点一一展示出来。”《人物》杂志则说她“捕获了每一个人的人性。”

与罗琳小说褒贬不一不同的是，另一位英国女作家的小说却赢得了众口称赞。10月16日晚，2012年布克奖在伦敦揭晓，英国女作家希拉里·曼特尔（Hilary Mantel）凭借《提堂》（**Bring up the Bodies, Fourth Estate, 2012**）一书摘冠，并获得5万英镑奖金。2009年，曼特尔曾凭《狼厅》（*Wolf Hall*）获得布克奖，这次是其第二次荣获布克奖，也是继澳大利亚作家彼得·凯利和南非作家J·M·库切之后，第三位两次获得布克奖的作家。

《提堂》（*Bring up the Bodies*）是上次获奖作品《狼厅》续集，是其计划创作的三部曲中的第二部。整个三部曲是关于亨利八世的首席国务大臣与权术大师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的生平与谋略。《提堂》的故事背景发生在1535年，通过克伦威尔的视角讲述了亨利八世的第二任妻子安妮·博林（Anne Boleyn）最初的胜利与接踵而来的最终厄运。正是克伦威尔一手策划了她那令人晕眩的陨落。2012年布克奖评委会主席彼得·斯托萨德（Peter Stothard）评价曼特尔是“当今最优秀的英语作家之一”。“她打破了历史小说的常规写法。”斯托萨德说，在这部小说中，曼特尔“用全新的方式书写了现代英格兰的起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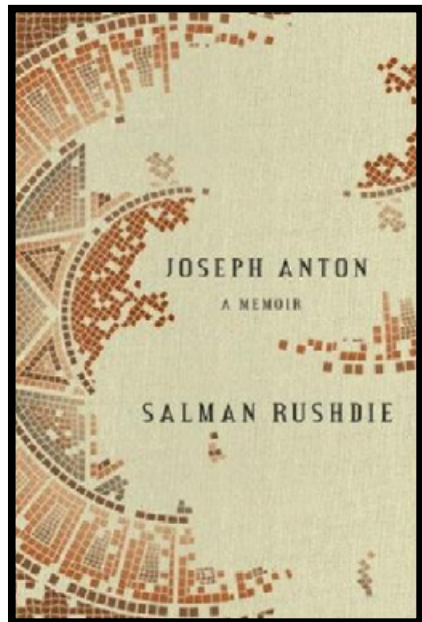
1989年2月14日，当时伊朗精神领袖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颁布宗教律令，以小说《撒旦诗篇》“亵渎伊斯兰”为由，宣



判该书作者、印度裔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死刑，并号召全世界穆斯林追杀拉什迪。为此，拉什迪躲藏了近十年。近日，兰登书店出版了其回忆录《约瑟夫·安东：回忆录》（**Joseph Anton : A Memoir, Random House, 2012**），回忆了这段东躲西藏的日子。根据其1981年的小说《午夜之子》改编的电影也即将公映。书名《约瑟夫·安东》，为其躲藏期间应警察要求而使用的化名，由其最喜欢的两位作家约瑟夫·康拉德和安东·契诃夫名字组合而成。而英国政府派来保护他的警察则常常简称他为“乔”（Joe），拉什迪厌恶这个简称。在回忆录中，拉什迪详细描述了自己的这段经历，起初，他“需要不停地找到下一个生活的

地方”，从一个朋友家转到另一个朋友家，后来，他学会了在租来的房子里生活，“四位全副武装的男人”（两位保护警察两位司机）住在边上。不仅他的日常生活受到影响，如去看疼痛的智齿需要复杂而秘密的程序，他的所有生活都从此吞没：如散步需要事先安排好；如清洁员来打扫房间必须躲在上锁的浴室中。这些都对他的写作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长期躲藏的日子，还让他学会了如何安全地进入一个房间（打量四周找到所有出口）；如何安全地走出一栋建筑物和等待一辆车子。1991年，他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演讲的保护堪称“豪华”：坐着英国皇家空军的私人飞机来到新泽西泰特罗波机场，然后坐着一辆白色装甲豪华车，在九辆摩托车警卫的护送下住进了酒店的总统套房，所有的窗户都是防弹的，“也许有两打人，拿着科幻小说中的巨型武器散落在整个房间周围。”拉什迪的回忆录共600多页，花了两年半时间完成。拉什迪说，“对我，这有点快了。”

回忆录以一个反对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公开冲突为开头，有些像911事件的序曲。拉什迪将它比作是希区柯克电影《群鸟》中出现的第一只鸟，在电影中，如瘟疫一般的群鸟袭击了加州的一个小镇。在接受采访时，拉什迪说，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愿意写这样一本书，因为这会困扰他，迫使他重新回到那段时间。而之所以写这本书，最主要还是本能。虽是回忆录，但全书使



用的是第三人称，“我一直不希望这是一本日记，或者自白书和控诉。我不希望它只是一本复仇之书。”

还值得注意的一本新书则是多米尼亚裔美国当代作家、普利策奖得主朱诺特·迪亚斯（Junot Díaz）的最新小说集《你就这样失去她》（*This Is How You Lose Her*）由河源出版社（Riverhead）出版。朱诺特·迪亚斯1968年出生于多米尼加共和国，1974年随父母移民美国。他最大的快乐就是在书本中寻求精神慰藉。大学期间，在托尼·莫里森、桑德拉·希斯内罗斯等作家指导下，走上创作之路。1996年凭借短篇小说集《沉溺》（*Drown*）一举成名。2007年，首部长篇小说《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

(The Brief Wondrous Life of Oscar Wao) 出版, 被《时代》杂志评为是当年最好的小说, 排名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超过100周, 印量超过一百万, 并获2008年普利策文学奖、全国书评家协会奖等多项大奖。如今, 他在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写作, 兼《波士顿评论》的编辑。小说集《你就这样失去她》讲述的是一些“爱的故事”——执迷的爱、病态的爱、消退的爱、母爱等, 这些故事都由一个叫尤尼奥尔(Yunior)的年轻人叙述, 总是围绕着一个未解之谜, 如其一位女友所说, 尤尼奥尔, “一个典型的多米尼加男人, 到底是不是变态, 是不是一个混蛋?” 小说毫不忌讳地描写了拉美男性的旺盛情欲所带来的“后果”, 尤尼奥尔总是不断渴求又不断失去——优雅的阿尔玛、年长的罗拉、认为所有多米尼加男人都是骗子的马格达莱纳等等, 将人性的渴求和无法克服的弱点展示出来, 告诉读者激情总是战胜经验, “半衰期的爱才是永远。”

一个未解之谜, 如其一位女友所说, 尤尼奥尔, “一个典型的多米尼加男人, 到底是不是变态, 是不是一个混蛋?” 小说毫不忌讳地描写了拉美男性的旺盛情欲所带来的“后果”, 尤尼奥尔总是不断渴求又不断失去——优雅的阿尔玛、年长的罗拉、认为所有多米尼加男人都是骗子的马格达莱纳等等, 将人性的渴求和无法克服的弱点展示出来, 告诉读者激情总是战胜经验, “半衰期的爱才是永远。”



歌者在天堂，生者在地狱



特约撰稿人 朱白（广州，youjinma@gmail.com）

“因为音乐是你的挚友/在火尖上跳舞，一如它所愿/音乐是你唯一的朋友/直到最后……销去我/复活的预约/把我的档案送到/拘留所/那里有我的朋友……波斯人的夜晚，孩子/看那光，孩子/救我们/耶稣/救我们//因此，当音乐结束/熄灭光/熄灭光/熄灭光/音乐是你的挚友……”（《当音乐结束》）当吉姆·莫里森在上个世纪60年代引颈高歌时，你知道那是一个充满激素和理想的时代，那时人们尚可歌唱某种情绪或者信念。尽管从现世和哲学的角度来看，理想都并非什么值钱的玩意，但能让人将一己血肉之躯为之付出的东西，无论如何还是值得你为之激动片刻的。

每一句歌声都如同对过去的缅怀，就如此时你的电脑可以随时播放出任一年代的任一歌声，那来之容易的，也容易在琐碎中令人怠慢。如今早已不是或重金买回或消耗时间淘来，然后再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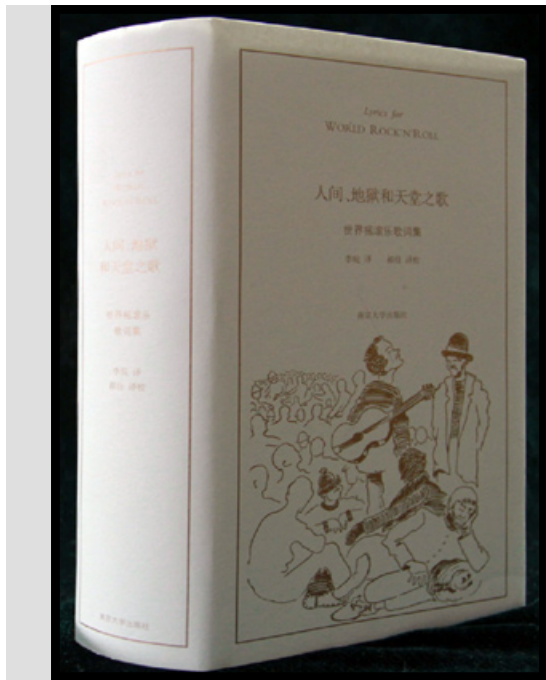
修粘贴，放进录音机后，瞬间陷入酥麻之境的时代了，不仅仅是仰仗科技取代了劳神的卡带和CD。还有聆听的方式，都已经不同了，更重要的是我们聆听的心态。忙碌取代了慵懒，急促取代了缓慢，多元取代了单一，消遣取代了虔诚，泛滥取代了挚爱……以此类推，这并非时代进步，也非老夫子痛苦挣扎上个时代美好的阵痛，而是时光之浪一点点在推进，从不肯以我们的志向而停留或倒退。这不可避免，也没人有力阻挡。

摆在面前的《人间、地狱和天堂之歌——世界摇滚乐歌词集》，当她变成一部厚达1500多页、中英文对照、近百万字的工具性“辞典”出现在现实世界中时，你已经可以先感受到一种古典的力量和美感。首先需要让我们产生敬意的是她的出版者，勇气显然已经颠覆了泛泛而谈的所谓商业规律，她厚重的形式感已然超出了普通出版物

的承载，她有如一部厚重而繁琐的工具辞典。然而你知道，这样一部介绍欧美摇滚乐歌词的书是不大可能如通常辞典的畅销的，出于缅怀，她大概只能是躺在少数文艺青年的书架上，偶尔查阅或者赏玩；或者是出于顶礼，而占据了图书馆书架上的一块领土。“工具书”无疑只是一个对工作者和出版者艰辛劳动的爱称，而无法使之应用拓宽到事实上的工具书那么广泛的范围。

聪明人都晓得，编选这样一部纵贯欧美摇滚乐三十多年（1963-1997）超过300首的歌词集，注定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更别提“翻译都会被人挑刺和发泄不满”的常识了。吃力，是要甄选以及鉴别、发现，甚至还有排除和舍弃，即便在这样一个互联网时代，找出如此浩瀚的歌词并选取版本，一定是件繁琐和多年积累出来的工作；不讨好，是在如此漫长的历史中，选了哪支乐队没选哪个歌手，以及选了多少、选了那几首都是仁者见仁的事，作为编者要承担起这个众口难调的责任，当然是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折中或者偏激都会遭来不满。

至于豆瓣上的网友代表，很多出于无厘头式的挑剔和谩骂，已经不属于这部书讨论的范畴。她没有理由和责任针对各种诡异读者提出的质疑一一承担。如果基于对细节翻译不满的吐槽，那是一本书应该面对的，而大量既无理又吵闹的嗡嗡声，那就让它光秃秃的存在好了。就个人狭隘目光来说，国内一定有比李皖更合适做编选这样一部浩瀚歌词集



李皖
《人间、地狱和天堂之歌》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5月

事情的人，但迄今没人能完成她也是真的，只有李皖这样做了更是真的，仅此，就不应该得到的那些胡闹般的谩骂。

编选+翻译注定只能等于失败？我不觉得，尽管她难免在问世之后不间断地成为人们挑刺的靶子，但她的成书已经称得上是一种壮举了，是否先天注定失败，已经是可以踩下脚下的问题了。

有人能做这样一个工作，首先需要勇气和野心，以及漫长的缓慢积淀，非一般爱好者或者职业编辑能够完成的。编选者李皖，算是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乐评人，也是与王小峰、颜峻、郝舫、孙孟晋、邱大立、杨波等共同承担起介绍欧美摇滚音乐的一代“传教士”。在资讯匮乏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无数苦闷青年甚至是靠他们的文字，而非第一手音乐来排遣孤寂的。所以，至今有人怀念起那个年代的乐评中的文字，感觉仍是凛冽而温暖的。那个年代的《音乐天堂》、《自由音乐》也成为当时青年的“圣经”，只是多少当年闷在寝室被窝里听《自由音乐》附送的CD的人，如今已经长成中年，虚胖和虚火成就了其沉沦于世俗的证据。对于音乐，唯一方式就是去听伦敦奥运会的开闭幕式，给人留下了关于英伦上世纪那绝代风华的音乐印记，那些都是欧美流行音乐史上的一个个坐标，他们的存在和曾经的癫狂，才令世界不至于那么难看。今天我们可以坐在硕大的液晶电视前，看那个时代的老人在集体

开演唱会，老人疯癫劲道、姑娘卓越风骚、年轻小伙子卖弄性感，这才是舞台上最应该展示的。奥运会变成一个集体怀念的场合，这当然也体现流行音乐的悖论之一：一方面她越来越被更多更迷人的玩意击退，她成了时代潮流的逆天之物，落后、停止、产业链断裂；另一方面人们在不再对她产生性欲的同时，要对之进行一阵阵的悼念和缅怀，甚至要为之鞠一把同情之泪，几乎所有人都不能断然否定流行音乐存在的合理性。

The Queen、John Lennon、Pink Floyd、Bee Gees、The Who等乐队和歌手以不同形式的“复活”，挽救了一代人的心灵归属去向问题，George Michael、David Bowie、



图为美国著名“大门乐队”主唱吉姆·莫里森

EdSheeran、FatboySlim等等新老人并非耀武扬威，最好也就是对逝去时代的一次狂欢式纪念。这部厚重而浩瀚的《世界摇滚乐歌词集》纵观欧美最鼎盛的三十年，将很多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歌与词重新打捞了出来，功劳与是非均不用世人评说，它们已经呈现在此了。

李皖说“翻译歌词是一次次惊喜的、狂喜的体验”，但阅读歌词可不一定，无论如何歌是并只能是用来听的。请相信李皖在这本书中说过的一句话——“诗写到纸面上或许不一定触动你，但听莫里森唱出来，绝对是一种震撼体验。”对于音乐，唯一的方式就是去听。如果这本歌词集唤醒了你对青春的记忆或者就此诞生了兴趣，那么放下，然后去听，用各种方式。🔴

纳粹这场戏，通胀是导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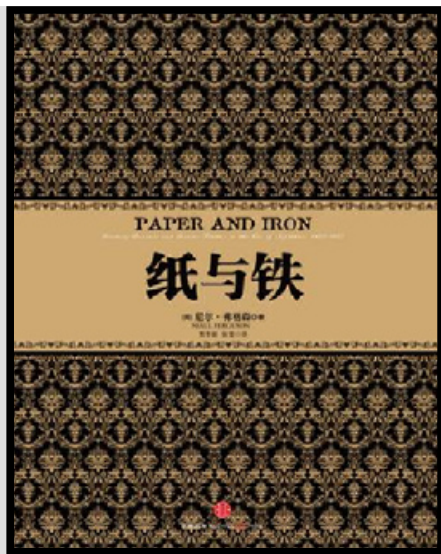
特约撰稿人 孙骁骥 (北京, sunxiaoji@gmail.com)

关于德国二战前后的历史著述，汗牛充栋。为中国读者所熟知者，有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撰写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柏林日记》等书。不过，妄图仅仅通过一两本书全面了解那段历史，尤其是纳粹上台的历史原因，只能称为一种历史的幼稚症。包括我即将向大家介绍的这本《纸与铁》，也仅仅为我们提供解读那段历史的视角一种。有心的读者需要通阅关于德国二战历史的各种书籍，然后或能得出一个较为客观的答案。我想，不但是德国史，我们对待任何一段历史都应该保持这样的态度。

说回《纸与铁》。这是英国经济史家尼尔·弗格森的著作。弗格森是经济史界著名的“报告文学家”，擅长把枯燥的经济史写得饶有兴味、层次分明。他在经济学上的专业性或许不如经济学科班出身的学者，但其敏感的历史意识，让他常能将经济分析带入重大历史事件当中，道出一

般经济学家所不能道。此书正是从这样的角度为读者分析了纳粹上台的经济原因。

先从题目讲起，这本书名叫“纸与铁”，它让人自然联想到了德国名相俾斯麦的“铁与血”演说。俾斯麦在1862年9月在会议中答复资产阶级想建立宪君主制的要求时有段名言：“当前的种种重



大问题不是演说词与多数议决所能解决的——这正是1848年及1849年所犯的错误——要解决它只有用铁与血。”在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也在亢奋的德国公众面前重复过同样激情洋溢的演说。只是物换星移，昔日的普鲁士已为魏玛共和国取而代之，令德国人焦虑不已的问题也换成了恶性通货膨胀，“铁与血”的历史诘问让位给了“纸与铁”（纸币与实体经济）的经济困境。

通货膨胀本身并不稀奇，人类社会自古有之。但几何级数的恶性通胀，可谓现代纸币经济体系的一大毁灭性“发明”。一般来说，通货膨胀率在100%以上时，被称为超级通货膨胀。但恶性通货膨胀是一种完全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其程度更为恶劣，最后往往导致经济崩

溃、政治解体等无可挽回的局面。

据统计，德国的货币供应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约为60亿马克，战时快速增长，至1918年一战结束时已高达284亿马克，增加了三倍多，通胀问题初露端倪。但仅仅如此，还算不上恶性通胀。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有一个著名论断：“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总是一种货币现象。”但如果沿着弗里德曼的话探究下去，我们还会追问：在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货币供应缘何会陡然增加？作为货币现象的通胀又是如何导致了德国的政治思潮的变革？政治变革又怎样引发了纳粹的上台？尼尔·弗格森在书中提出了他的观点，他认为：通胀是当时德国政府大幅增加财政支出的直接后果，“为了融资，不仅扩大了公共债务规模而且扩大了货币供给，甚至



图为凡尔赛和约现场

为货币无限增长创造了空间。”

一战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让战败国德国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加上德国在战后损失了鲁尔工业区这样的经济命脉，工业产值倒退回19世纪末叶水平，城市经济受到重挫，一时难以恢复元气。战后德国国内时局动荡，暴乱频发，眼看着就要还不起巨额战争赔款，因此，德国政府走投无路之下只好铤而走险，大量发行纸币，迫使马克汇率贬值，增加出口，并通过财政赤字政策刺激经济。此外，政府资助企业提高薪酬的补助增加，但失业人员依旧在增多，住房补贴、食品补贴等等各项补贴开支不断增大，“补贴项目一旦启动，就很难再停下来”，福利开支成为当时德国的一大财政黑洞。总而言之，货币超发、公共开支过大、高额赔款可以说是1920年代德国恶性通货膨胀

的直接诱因。

德国人事先并没有预估到事态竟会如此不可收拾。“以议会化、与多数社会民主党合作为立宪方向；同时通过解除管制和马克贬值来振兴德国商业贸易，哪怕面临着通货膨胀加剧的风险。”这是一战刚结束时德国制定的经济复苏战略。谁想一语成谶，这个计划美好的前半部分顷刻间化作镜花水月，而通胀的风险却实实在在地到来。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偶然吗？弗格森认为，当时的德国内忧外困，处境艰难，政府除了用财政赤字和货币贬值的策略来应付当时的困境之外，似乎也找不出更好的办法。

德国人的愿望很美好，残酷的现实却把他们美好的愿望彻底击碎。然而，这个“复兴德国”的美好愿望有着一个让人忧虑的内核——社民主义。有不少人



图为1933年焚烧犹太人著作的现场

认为纳粹的上台是反犹太主义在作祟，其实不然。犹太人自古在欧洲名声欠佳，古时从事经商和放高利贷，近世满世界煽动政治革命，因此常处于人们的猜忌之中。就连法国革命时期的思想家伏尔泰也对犹太人不抱好感。换句话说，欧洲对于犹太人的抵触情绪长期存在，但却很少像纳粹德国时期那样，上升拔高到国家政治层面。为什么在那个时期鼓吹“反犹”的纳粹党会获得言论市场并成功上台呢？弗格森在书中所论及的“恶性通胀”只是为这段历史搭了一座经济的台，真正上台唱戏的是政治上的社民主义。

众所周知，德国在政治体制上长期落后于英法等欧洲强国，民主进程缓慢。当年的普鲁士王国奉行先军政治和国家主义，这对20世纪的德国政治文化产生了持续而深刻的影响。而在这个时期，也是马克思的政治思想风靡欧洲的时期。德国境内成立了不少像是“社会民主工党”这类具源自马克思政治理论并且宣称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便是其中之一。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鼓吹建设“有德意志特色的社会主义”，其特色，在于将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杂糅，宣称在德国实现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暗中搞破坏的是犹太人。这很巧妙地为德国政府货币超发捅出来的篓子找到了一个替罪羊。

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具有社民主义倾向政党的党魁希特勒粉墨登场了。他所做的一系列表演活脱脱就是赵本山小品《卖拐》的德国版。这个类比并非在开低

俗玩笑，二者在逻辑上的确有诸多相似。就像赵本山扮演的“大忽悠”一样，希特勒先是忽悠大众说，犹太人的“经济阴谋”破坏了德国战后的经济建设，德国民众一看这残破的经济局势，信以为真，泪汪汪接下了希特勒卖的这副拐；第二次，希特勒的纳粹党已经依靠竞选成为国会中的大党，这时，他卖的已不再是拐，而换成了轮椅——国家主义的轮椅，德国人再次欣然接受他的忽悠，希特勒借此成为了国家元首。再往后，人们就看到了第三帝国的建立和惨烈的二次世界大战。

弗格森在书里说，1920年代德国的恶性通胀发生之时，有不少德国民众认为投机商通过通胀掠夺了人民财富。希特勒和纳粹党聪明地将“投机商”和“犹太人”二者偷换概念，把经济矛盾转变为了政治上更有市场的民族主义。而在经济之外，19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向人们灌输的勤劳节俭、重视文教的美德，也随着恶性通胀被破坏殆尽，人们对现行政体感到极度失望，这客观上也为日后纳粹党在政治、思想的确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总之，如果说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是一场戏，那么通胀就是导演。德国的历史经验说明，政府用通货膨胀来医治国家的“经济病症”之举无异于饮鸩止渴。尽管恶性通胀不一定会导致纳粹的兴起，但在一个国家主义思维盛行、人民受愚弄、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国家，恶性通胀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或许就会招致纳粹主义，“纸与铁”的破灭终究会让“铁与血”的恐怖重回政治舞台。🔴

帝国与自由主义的相互依存



特约撰稿人 吴强 (北京, qiangwu.de@gmail.com)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家总是要介入政治的，这是政治学的现实关怀使然，也是政治本身作为人类文明的最高层次的内在要求，必须向包括学者在内的政治共同体成员开放。清华的政治系，国民政府期间，始终朝气蓬勃，跟政治系的议政、参政的风气密不可分。比如说1915年，仿效美国政治学会，清华政治系在北平率先成立了中华政治学会，比后来在南京成立的中国政治学会早了17年，他们每次的聚会谈的便是各种政治理念、主张和权谋，对新兴共和的批评并未停留在清议层面，而是颇有深度且具国际视野的对“五都搞”的研习和建策，如后来的政治系主任浦薛凤对学术和时政两者双向的深度卷入，绝非半个多世纪后大陆的政治学教授一旦入宫便不再见人。

1934年从清华政治系毕业的楼邦彦，也是这么一位视政治为己任的学者，虽然他在1952年之后便身不由己地被打

倒、与罗隆基等并排被毛泽东点名批评，然后亲身经历了最为惨痛的知识分子的被清洗政治，但是，抗战期间，身在大后方的楼邦彦照样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角度来分析盟国——英国或者不列颠帝国的统治问题及其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可能面临的挑战。这便是这本旧书新刊《不列颠自治领》的背景。

其时，大约1939年前后，楼邦彦从昆明转到重庆，也是大抵抱着实操政治的想法，向政治要人靠拢，一度投身蒋先生的侍从室。据说这是清华某张姓老人的想法，主张年轻人各自寻找靠山，以图振兴。这当然首先指的是政治系的振兴。虽然，据楼氏后人回忆，在蒋先生侍从室待了三个月，一次也未获召见，楼邦彦醒悟自己到底是宁波人不是奉化人，终难获信任，遂离开。不过，楼邦彦自此在重庆住了下来，从1942到43年楼氏离开重庆赴胡宗南长官处前夕的一年间，这

本《不列颠自治领》的各篇章在《世界政治》杂志上陆续发表，倒是契合了当时国府的战略需要，对国人于战后的世界局势思考也颇有助益，这是战时极困难下楼邦彦对中国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贡献。

那么这本《不列颠自治领》到底契合了国府当时的何种考量呢？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形势骤然改观，美英苏中等国联合发表《共同宣言》，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司令官，中国也随后派出远征军入缅作战。缅甸当时作为英属印度的一个东部省，盟军在缅甸战场的展开即联结着中国和印度、英国，战场形势关系着能否尽早打通这条对中国战场补给有着决定作用的通道。在长沙会战胜利的鼓舞下，蒋介石1942年2月出访印度，希望争取当时已经如火如荼的印度自治运动的支持，以为通过游说英国政府给予印度一定自治权，便可换得印度的支持，共同抗日，至少对缅甸战场的英军也是一个战略牵制。此行，蒋介石夫妇，率领外交部长王重惠、航空委员会主委周至柔和中央政治学校（今天的国立政治大学）教育长张道藩等，到达印度后努力争取与甘地见面。此前，甘地因坚持不合作精神、拒绝暴力，也与愈来愈烈的印度时局脱离，已经不再担任国大党领袖。虽然甘地不为蒋介石的陈情所动，蒋介石一行最终无功而返，但是不能不说，蒋先生的这一外交行动，尽管也为英国政府所戒备，却是相当大胆，富有长远的战略机谋。蒋公身后，他及一千人等与甘地的合影仍然高挂



在台北中正纪念堂的墙壁上，足见民国官方历史对此次行动的高度肯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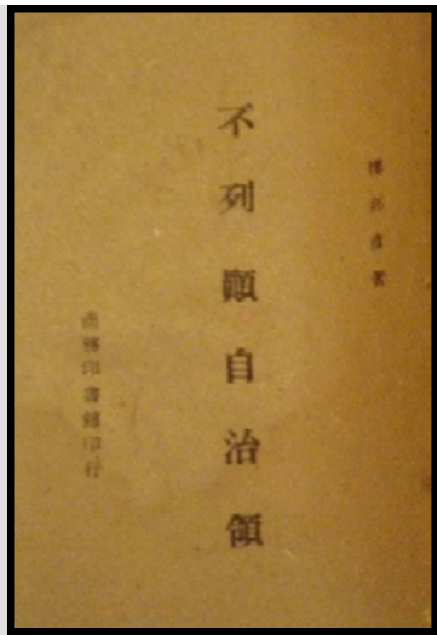
如此背景下，方显楼邦彦对英国自治领关系著述的重要意义。印度作为不列颠治下的一个自治领，其自治地位虽然不可与澳洲、新西兰、加拿大、南非或爱尔兰相提并论，但是即使这些传统自治领在不列颠帝国内与英国的关系也并非完全等同，稍早在一战时的表现更其各有自，具有相当的特异性，却未损不列颠帝国的统一。楼邦彦将其归诸为女王在不列颠帝国中的特殊地位，由对她的个人效忠保持了自治领与帝国的一致性，这种宪政安排中所体现的重实际而非以逻辑一致为行动的准则，是理解大英帝国存续的基石之一，也许就是楼邦彦从中窥

见的中国可能与不列颠各自治领之间展开主动外交行动的机会所在，犹如加拿大在两次大战中所表现的更为独立、积极的姿态。在这个意义上，楼邦彦的学术著述当对蒋介石的印度之行乃至战时外交所具有的潜在贡献不容忽视，对读者理解战后的不列颠帝国或者英国的外交政策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意义。

而楼邦彦对不列颠帝国自治领关系的论述，又是围绕具体案例展开的，其中几个最有趣的，一是英王爱德华八世的婚事，二是帝国会议，三是自治领的宣战权或者参战权的问题。依次，我们可以看到不列颠自治领关系的发展，是如何在一个普通法的框架下，本着实际的、灵活的、问题导向的路径而非僵化的逻辑原则发展出丰富的帝国内部关系。楼邦彦的讨论方法也是务实的，对待上述每一个问题，也是从总结较保守的观点开始，然后归纳各自治领与帝国间变化的关系及其法律含义，最后发现帝国政治内变与不变的原则或者路径。这便是自由主义的思维方式，也是极难定义的自由主义的本质之一，相当吻合他在伦敦政经学院的导师拉斯基的理念。作为英国的左派代表、工党领袖拉斯基，其实是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深谙自由主义无法从内部得到更新和重建，19世纪法国的历次革命都未动摇自由主义的基本财产权却展现了自由主义难以弥合的冲突，他相信须从外部也就是发动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才可能真正挽救自由主义，比如对私权进行规制的罗斯福新政。1930年代拉

斯基参与的这场辩论甚至延续到20世纪末的罗尔斯与诺奇克之间，拉斯基作为政治自由主义的开山者之一也因此倍显其在实用与逻辑间择其前者的自由主义路径。在这意义上，普通法的逻辑或者说不列颠帝国与自治领关系的逻辑也可说是自由主义的。

回到《不列颠帝国自治领》的文本，由六个先后发表的相对独立章节构成，依次是：不列颠自治领与英王、不列颠自治领与英国国会、不列颠自治领与帝国会议、不列颠自治领的对外关系、不列颠自治领与对外战争、和不列颠帝国的缔约权。第一章，开宗明义，楼邦彦在此章交代了自治领的非逻辑特性：帝国的统一并不妨碍自治领的自治发展，英王的



楼邦彦
《不列颠自治领》
商务印书馆
1944年重庆初版
此文为最新版的导读



权力仍可及于各自治领。而且，恰恰在如此通常难以理解的貌似悖论的法律基础上，不列颠帝国和自治领的关系才得以维持和更新。楼邦彦将之归为英国宪法习惯、帝国议会和英国议会三者的共同作用，源自三条法则：其一，自治领国会议决修正帝位继承或帝号的法律，须经其他自治领与英国的国会的同意；其二，英国国会修改关于帝国继承或者帝号的法律，应须经得所有自治领的国会的同意；其三，英国国会修改关于帝国继承或者帝号的法律，若欲适用自治领或称为自治领法律的一部分，亦须经由自治领请求且获得自治领国会同意。此三法则为1931年威斯敏斯特法所确认，承认了规范上述自治领与帝国关系的三个权威：王位、英国国会和自治领国会。楼邦彦在全书中尤为看重最后一个，即自治领国会或者他们的代表——帝国框架内帝国议会的发展，反映了也同时作为自治运动逐

渐发展并受到承认的媒介和结果。

其要义在于：王位是不列颠联合组成个体的象征，自治领对不列颠的效忠非基于其他，而完全系于对王位的归依，即英王是不列颠帝国之为“身合国”的象征和纽带，王位对与英帝国的存在具有超乎一切的重要性，各自治领总督也是英王的代表。另一方面，凡涉及帝国继承和帝号变更，都需经由自治领国会同意，足见自治领国会在帝国内之法律地位，并且由此展开更进一步的自治权力扩展，帝国便与自治相辅相成，无论英国行政当局或者英国国会如何。这也是1926年帝国会议决议所规定的：自治领与英国享有平等之地位，共同组成英联邦，并且共同归依于英王位。当英王爱德华八世与美国平民女子辛普森夫人结婚并且面临王位更迭时，各自治领对爱德华的退位和乔治六世的承认在那过渡的几天里出现了“混乱”，英国与各自治领间的上

述关系便生动地体现出来。

第二章，不列颠自治领与英国国会的关系，同样可以发现楼邦彦采取对英王制度作为“活的制度”类似的观点，在发展中理解自治领与英国国会的关系。较诸与英王的关系，这一关系更实际一些，毕竟英王对自治领的意见都由国会提出，按照宪法习惯，绝少反驳。历史正是如此，1860年南澳最高法院的判决改变了自治领与英国国会的关系，不再尊奉自治领的法律不得与英国国会的法律相抵触的普通法，而是放宽解释为不得与英国法的基本原则相冲突。此判例直接导致1865年英国国会通过《殖民地法律效力法》，然后到1931年《威斯敏斯特法》的变化。这种变化，便是英国国会享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威权的逐渐动摇。

而产生此动摇的，楼邦彦提出，仍然是1931年之前的一条宪法习惯，英国国会需将其法律适用于自治领时，须事先向自治领咨询并获同意，否则自治领可任意适用或修订或径自制定法律。这条习惯为自治领自治权力的发展大开了方便之门，直到1931年威斯敏斯特法确认了自治领与英国国会间新的关系，即对自治领国会所享有的完全权力的确认，不会因自治领的法律与英国法律冲突而无效，而且英国法律适用自治领须经自治领请求与同意。

第三章，威斯敏斯特法对实现空前的自治领与英国地位平等意义巨大，但是其创制者却是帝国议会，最终成为推动自治领与英国关系调整、然后塑造一个

新的帝国的发动机。

楼邦彦追溯其前身“帝国殖民会议”时说，帝国殖民会议的创立却是偶然产物，非刻意的制度设计，参加者也认为纯粹一个咨议机构，而非权力机关。但是，帝国殖民会议的召开以及后来帝国议会的早期会议，却都因帝国或者王室的重大典礼而相聚，到1911年正式转成帝国议会，尔后因为战争爆发而产生的战争协调需要强化了此机构的重要性，并在战后逐渐正式化，反映了自治领战后对承认战争贡献的要求，楼邦彦也是在其实功用上强调其于帝国的重要性。

第四章，不列颠自治领的对外关系，楼邦彦叙述的不是自治领的对外政策，而是体现自治的外交主权部分。这些有关参加国际会议、参加国际组织、缔结条约和确定邦交等等外交权力，都围绕着一战前后的宣战权和战后赔偿、军控等现实需要而得到逐渐扩展，自治领日渐独立平等，比如在与苏俄建交问题上，加拿大1924年因不满英国工党政府未与各自治领协商而承认苏联，便采取单方面直接行动与苏建交；慕尼黑协定后，爱尔兰与南非保留了一旦战事爆发则可能采取中立的态度。

如此等等，战争成为自治领走向充分自治的契机，第五章的“自治领与战争”集中论述了在战争这个特殊时期自治领与英国的冲突和关系发展，几乎是在战争中，自治领的自主意识空前高涨，也难怪蒋介石对于争取印度独立运动的支持抱有巨大希望。楼邦彦的关注点同

样落在战事前各种理论莫衷一是，直到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现实政治的发展特别是二次大战的爆发，终将英国的保守理论如基斯的传统主张彻底否定，自治领完全可能采取中立地位并未得到英国承认，此系自治领的自主权力所在。

第六章，可视作前一章的扩展，更是全书理论的现实性所在。1943年初，二战正处于一个转折点的前夜，斯大林格勒战役到了最后尾声，北非阿拉曼战役胜负已见，二战即将迎来盟军登陆意大利、中国组织第二次远征军入缅作战、德黑兰会议也将在年底举行。1月11日国民政府签订中美条约和中英条约。之后仅十数天，“不列颠帝国的缔约权”一文便发表在《世界政治》期刊上。该文（章）尤重指出，“条约的一方不论是一个或所有组成不列颠帝国的个体的政府，必须以英王的国家元首的名义缔结之”。如中英条约序文所述，缔约方为不列颠帝国之“大不列颠爱尔兰及海外诸自治领君主兼印度皇帝陛下”，而“不列颠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特派英驻华大使薛穆为全权代表”。条约中援引加拿大1923年先例及帝国会议，明文承认印度的国际独立地位以及，与各自治领事后的双边签约仍以英王名义。中国在战后新世界秩序中的格局由此豁然而定，此为英帝国及自治领在战时关系的自然结果，亦为楼邦彦秉持的英自由主义所诠释。

对楼邦彦的个人命运，自由主义亦留下了时代的烙印。他虽然师从拉斯基，做了半年研究后，却向拉斯基辞行，想到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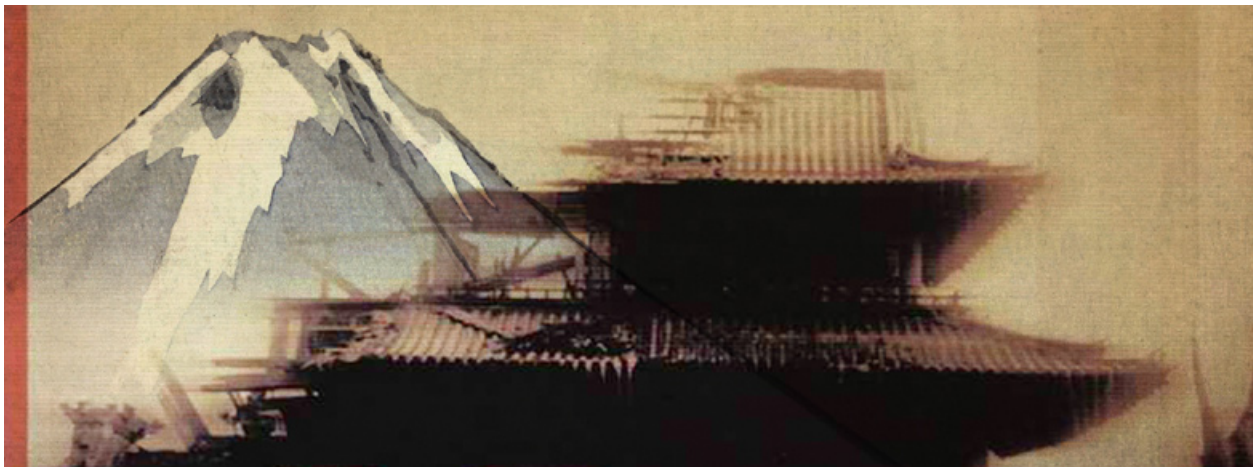


洲大陆游学，拉斯基竟然照准且帮他继续申请南京政府的资助。甚然，游学法、德不到两年，接到钱端生希望他回清华任教比较行政法的信后，竟然抛下学业，先行回国。在他看来，能拿到清华的聘书比拿到博士更为实际，也才有了后来这些对行政法以及自治领研究的成果。其后，楼邦彦的命运也如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一样多舛。从1949到57年，楼邦彦虽然一度得到党的器重和培养，曾任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还被史良看中有意让他担任司法部长助理，行政级别被定为干部10级，但反右运动开始便因为他与拉斯基的另一位学生储安平的关系而被划为右派，从此入了另册。

不过，仿佛后来在北大教书的日子里楼邦彦对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发展所感到的振奋，英帝国也基于强大的自由主

义和普通法传统，在经历了战后更为汹涌的独立浪潮后，虽不复当年日不落之辉煌，英联邦仍矗立不倒，并于1970年代初加入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开始了另一个帝国的试验。就连香港，在脱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后，仍因为普通法的保留而保持着与帝国的某种法律联系，从而可在普通法的范畴内审视或者对一国两制保持法律上的某种独立地位。由于英美的自然法传统使得普通法庭得以进行分散的司法审查，如香港的普通法院便可能因此审议基本法或者中国人大常委会的相关解释，从而在司法体系上真正维护了特区自治。英宪和普通法的精义或及于此，而自由主义所观照的一国两制甚至未来的两岸三地关系的发展，当可继续从楼氏所述的不列颠与自治领的关系中获得有益借鉴。Q

“屌丝”的芥川奖



特约撰稿人 刘柠(北京, postdadaist@gmail.com)

关于芥川奖的缘起与历史,前辈作家李长声先生已多有介绍,无需笔者再饶舌。但我想谈的,是另一个问题,即芥川奖的“屌丝”化问题。

芥川奖,作为日本顶尖的纯文学奖项,一向被国民视为东洋的诺贝尔文学奖,是作家成功的“窄门”。得奖与否,结果迥异。虽说奖金只有100万日元,但获奖作品成为畅销书几乎是题中应有之义。幸运的话,甚至有可能成为百万级大畅销书(Million Seller)。更主要的是,“芥川奖得主”是一个含金量极高的名头,基本可确保该作家今后作品的畅销或长销(Long Seller)。只需看一串获奖者的名字,便知道这个奖对日本作家来说意味着什么:石川达三、安部公房、松本清张、吉行淳之介、远藤周作、石原慎太郎、大江健三郎、丸谷才一、村上龙……遑论太宰治,因与芥川奖擦肩而过,至死耿耿于怀。

如此崇高的荣誉,注定了芥川奖的精英气质。这从得主的学历构成上亦可见一斑:早稻田大学(27人)、东京大学(20人)和庆应义塾大学(8人)位居三甲,其次是法政大学(6人)和明治大学、东京外国语大学、京都大学(三校均为4人)及九州大学(3人)。但近年来,该奖却有一种去精英化的趋势,确切地说,是“精英与屌丝共舞”。如2004年,分享第130届芥川奖的两位80后女作家绵矢莉莎与金原瞳,前者是早稻田大学教育学部二年级学生、史上最年少芥川奖得主(19岁),后者则是高一即退学的“问题女生”;2011年,荣膺第144届芥川奖的两位得主,一位是庆应义塾大学文学硕士、知性美女作家朝吹真理子,另一位是初中毕业的蓝领作家西村贤太;今年春,荣获第146届芥川奖的两位,一位是东京大学的博士后圆城塔,另一位是专门学校毕业后没工作过一天,闭门写作的“啃老”宅男作家田

中慎弥。在迄今为止共计151位芥川奖得主中，未进过大学门者仅五、六人而已，且多集中于近几年，与日本社会的“下流”化当不无关系。1952年，以小说《某“小仓日记”传》荣膺第28届芥川奖的松本清张虽然也是高小毕业，但他获奖前是一流大报《朝日新闻》的名记者，不仅不属于“屌丝”，而且堪称精英中的精英。而真正代表芥川奖“屌丝”化的，是新生代作家西村贤太和田中慎弥。

同为“屌丝”作家，二人在出身、经历及写作习惯上颇有相似之处。一是同为单亲（母子）家庭。西村出生于1967年，幼时父母离异，西村与长三岁的姐姐跟母亲一起生活。受姐姐的影响，他从小浸淫印刷活字，小学时便读过《绿山墙的安妮》、《居里夫人》等书籍。在东京都町田市立中学读三年级时，听说父亲的被捕、收监是由于性犯罪（1978年，其父因强盗强奸罪被治罪），内心受到极大冲击，开始翘课。终于放弃升高中，离家出走。出生于山口县下关市的田中慎弥，幼年失怙，靠母亲抚养成人。中学时，即嗜读父亲遗留的藏书，尤好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和三岛由纪夫。县立下关中央工业高等学校毕业（相当于中国的职高）后，没考上大学。遂宅在家中，靠母亲供养，从未打过一天零工，全部时间用来阅读、写作。仅《源氏物语》，便通读过五遍——两遍原文，三遍今人翻译的现代语本。

西村有过一些社会经历，但都是底层的，先后当过港口搬运工、居酒屋的店小二、保安员等。1990年，还在品川的屠



宰场练过活，“那种残酷，禁不住叫出声来，结果一天就辞了”。25岁到29岁，不止一次在打工场所或餐饮店与人发生口角，进而出手殴斗，甚至袭警，进过拘留所，被东京地方法院判处罚金刑（一种轻微的、但却是正式的刑事处分）。这些底层历练，对作家来说当然不尽是坏事，包括芥川奖获奖作品《苦役列车》在内，西村的小说多有较强的自传性。同样是残酷青春，但品质已完全不同于前辈作家（如石原慎太郎、大江健三郎、村上龙等）。他说自己身上有种“负的气味”，而这恰恰是自己作品的价值之所在。在谈到《苦役列车》时，他借题发挥道：

贯多（即小说主人公）在11岁、父亲被逮捕时，人生轨道便被铺设好了……这种感觉，在我自己来说，至今挥之不去。

如此浓烈的“负面”气质，藏是藏不住的，无论如何会“挂相儿”。2011年1月，第144届芥川奖评选结果发表时，各大报纸刊登了两位得主手持各自获奖作品的照片：长发披肩、笑容可人的“白富美”作家，父亲、姑母均为著名法语文学翻译家的朝吹真理子的旁边，是身体粗壮、脸膛黝黑的西村，面无表情，整个一“美女与野兽”的平成版。记者的报道也刻意强调蓝领作家的“另类”，诸如中学毕业的“飞特族”、父子两代均有犯罪前科等等，语不惊人死不休。

如果说西村贤太的底层经历，在他身上沉淀了一种类似江湖气的“气场”的话，田中慎弥的性格则更“宅”，气质上更自闭，也更沉潜。这位职历为零、将宅男进行到底的70后作家，有很强的虚构才能。他的人生经验极其单纯，没有女友，也“没胆儿去风俗店”；熟悉的异性，仅限于母亲和街上方便店里的售货员，但却并不妨碍其小说中出位的性描写。作为宅男，田中有大把的时间。他出道很早，20岁开始创作，十年间遍得除芥川奖之外的所有重要纯文学奖项（如新潮新人奖、川端康成文学奖、三岛由纪夫奖等），已俨然文坛老炮。

哥俩都不用电脑，喜欢在旧日历或废传真纸的背面打草稿，然后再誊抄到原稿纸上。西村用圆珠笔或签字笔，而田

中则只用铅笔。东洋文人中用铅笔写作者比比皆是，但田中作家之独钟铅笔的理由很特殊，多少透出某种“屌丝”特有的气质，感性、纤细、环保、谦卑：一是用钢笔写错了的话，没法擦，“纸太可惜”；二是觉得“钢笔很神圣”，自己“不配”持有金色的金属笔尖。

田中的作息相当严格：晨九时开始写作，傍晚收工。不吸烟。晚餐时小酌，字斟自饮，量则以两杯葡萄酒为限，并不贪杯。饭后读书，子时就寝，雷打不动。一介宅男，自律到了近乎严苛的程度。而西村是不折不扣的“夜间型”——普罗作家，似乎天然仇视效率：中午起床，磨磨蹭蹭到晚上。又晃荡几个钟点，夜十一时，进入写作状态。因为一天要消耗约百支香烟，开始写作前的头一件事，是确认香烟是否充足——没有5包存货的话，便会陷入不安。写到凌晨四时许，想酒喝了，便停工。那个时辰，即使是通宵营业的酒吧也打烊了，只有在家自酌。清晨始就寝。

最戏剧性的，是哥俩对获奖（包括获奖前的提名及落第）的应对。芥川奖由《文艺春秋》杂志和日本文学振兴会联合主持，由9位评委提名、评选，一年两度（上半期和下半期）颁奖。日本虽然是一个“文学的国度”，但每一届芥川奖的候补者和最终获奖者，其实都出自一个很小的圈子。评委、几家纯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被认为离芥川奖最近的主流作家，大多是熟面孔。

西村在2010年折桂芥川奖前，曾两次被提名候补。每次均照惯例，与出版

社编辑们一起在银座或筑地的某间酒吧边喝酒应酬，边等结果。可结果一发表，花落人手，编辑们转眼间作鸟兽散。可怜见的，只剩下落第作者一人向隅而泣，有如天涯伤心客。如此场景，候补者着实“伤不起”。一而再之后，第三次提名时，西村作家决定独自在家中候消息。他心中并无多少胜算，一个劲地告诫自己“横竖已经是人家朝吹真理子的了。无论发生什么，都别狼狈不堪”，同时却不忘按下数字电视的录像键，好把NHK的新闻速报存在硬盘上——“到底是独身生活，万一错过的话，可就看不着了……”内心的珍视溢于言表。获奖的消息一发表，他第一时间冲到楼下，见两名新潮社的编辑已经在“守株待兔”。哥仨相互拥抱，然后径直赶往东京会馆（芥川奖颁奖式的会场）。

田中的情况，倒没那么戏剧性，却更加悲催——第五次提名才美梦成真。头一次被提名时，完全出乎意料。出道以来，虽然一路写下来，但从未想到自己跟芥川奖会有什么瓜葛。因此，除了吃惊，还是吃惊。第二次成为候补，便多少有了点精气神，开始抱一点小野心。但宅男作家唯恐“伤不起”，即使怀抱野心也是相当隐蔽的，对外则一概做不在乎状。田中并不是连续候补，基本上是隔一年提一次名。三度落第后，他内心的欲望之火已然熄灭，但命运仍在不停地戏弄他，撩拨他。而每次被提名，在被获奖与否的悬念折腾的同时，还要应对出版社和媒体，田中早已身心俱疲。每次在酒吧与出版社



编辑等待评奖结果时，“该以何种面目出现，在技术上很难拿捏”：表现得过于失望的话，会让周围也跟着沮丧，不太好；可刻意表现阳光，手舞足蹈的话，结果往往更惨不忍睹。如此反复权衡、表演四五回的话，料也就尽了。

今年1月，田中第五次成为芥川奖候补者。照例跟一群编辑在银座的一间酒吧里喝酒、守候。宅男作家平时不用手机，也没有。可为了等结果，编辑给了他一只预充值的手机，权当接收“朗报”的第一平台（该机的号码已预先知会了评委会）。田中后来回忆说：

即使周围的编辑们在扯闲篇的时候，大家的注意力也都集中在我手里的手机何时进来电话这一点上，我能觉出非常伪善的时间的流动。那时的压力可真够厉害的。

手机屏幕一闪，众人立马安静下来。

“我冲着离自己最近的编辑，用手指做了个OK的手势，权当知会。只一瞬间，大家的掌声、尖叫声涌起，我一下子便被卷入狂欢的潮水中，甚至连咀嚼一下兴奋的时间都没有。”

“屌丝”一朝登龙门，自然不同于精英作家在获奖时的表现。哥俩获奖后对媒体的“感言”，一个比一个出位，要多酷有多酷。西村作家面对电视记者“接到获奖通知时，你正在做什么”的问题，嘻皮笑脸地答道：

我正在琢磨去不去风俗店的当儿，接到了评委会的电话。看来没去（风俗店），是对的。

在芥川奖76年的历史上，从来没见过如此不正经的获奖者及获奖感言，西村的发言遂被媒体诠释成“普罗作家的无赖派演技”。这其实冤枉了西村作家。因为，“如果没能获奖的话，是要以女体来抚慰一下自己的心——毕竟是以落第为前提的话，我确实那么想来着”。

与普罗作家相比，宅男作家的获奖感言更酷。他引用好莱坞明星荣膺奥斯卡奖时的话来自已的心境：

雪莉·麦克莱恩（Shirley MacLaine）尝言“我获奖是理所当然

的”，我大体上也是这种感觉。

对领奖这件事，他表示原本并无意应酬，可是，“若拒绝的话，又怕那些气质懦弱的评委因此而晕倒，从而导致（东京）都政的混乱。为都知事阁下（石原慎太郎）和各位都民的立场计，我就替你们先领了”。此言一出，先于评委，台下的记者晕倒了一片。

对于五次提名终获奖的“好事多磨”问题，他显得更不耐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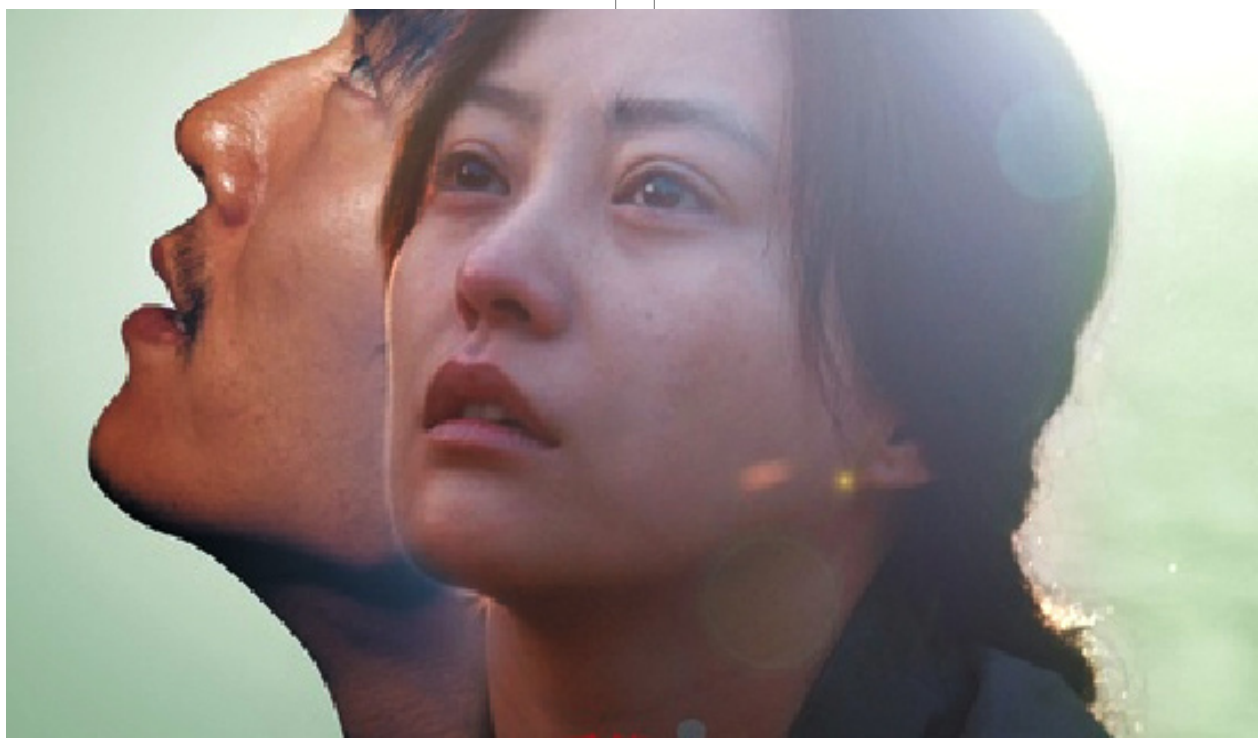
第一次提名即获奖最好不过。五次提名才获奖的，是蠢货。就这样吧。快结束吧！

一般说来，在庄严的芥川奖颁奖典礼上，获奖作家的即席感言都是在心里反复彩排过数十遍、上百遍的烂熟于心的老调子。但“屌丝”得主的发言，随机性却很强。不过，后来田中承认，在感言中提及雪莉·麦克莱恩，“确实有腹稿”。此外，《每日新闻》记者发现，田中作家“或许是过于紧张的缘故，他身子深陷在椅子上，一副不高兴的样子……”

日本大报记者是很坏的，目光刻毒。宅男作家旨在杯葛、消解芥川奖正统性的故作惊人之语的姿态，在他们眼里，恰恰反而成了“屌丝”的博出位之举。Q

姜烨城事

特约撰稿人 言一 (成都, richard7briner@gmail.com)



看完电影2天,在补上了《花》之后,才突然意识到:当姜烨声称自己从拍自己的故事转向了拍别人的故事时,也渐渐地从(个体的)“情绪”走向了“关系”——人与城市的关系,城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细想起来,在姜烨摇晃的镜头之下,那些城市总是晦暗的,却带着一种暧昧的鲜活。不论是《春晚》里的南京,《花》里的巴黎,再到如今《浮城》里的武汉,他似乎总能从类似于后街的地方

找到一些缝隙,通过镜头的放大,击中那些对这个城市无比熟悉的人们。

南京和武汉都在江边,巴黎也依傍着塞纳河。可水的存在远不足以成就一座“浮城”,哪怕加上姜烨近乎标志性的雨水也不行。作为物质实体的城市建筑在姜烨的某些镜头中确实宛若浮于水面;但对于一座城市而言,漂浮其中的除了可以是建筑,更可能是记忆,情绪,味道,关系这一类难以用手指去触摸的东西。

《浮城》的开场是一起死亡事件。

由此引出了一个过着双重生活的男人和一场正室小三间的缠斗。狗血的气场挥之不去。然而，看到最后，你会发现死者最终成为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人，一个局外人，一个偶然。她全然地无涉于那个名为“婚姻”和“家庭”的战场，而顶多只是被人当作了棋子。她的无足轻重无限地接近于微博上取消关注时的简单与随意。但问题恰恰在于：就是这样的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她死了。

在日本的本格派推理小说中，通过精密的设计与执行并最终成功行凶脱罪的群体性犯罪并不少见。《浮城》中的情节与此有些类似，区别只在于：在《浮城》里面，大约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一心一意想要置少女于死地的。也即，如果有“如果”，少女本是可以不死的。进而，少女之死站到了精密设计的对立面。整个事件的谜题也不再单单落于作为旁观者要如何发现少女抵达死亡途中的一次次推力，或者说案情要如何告破。这一切都显得过于表面。或许姜烨真正想要追问的是：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力量造就了这种无意识之下的偶然——当这种偶然以死亡事件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被迫不得不去面对这种偶然。我想，这大概是何姜烨会在影片名中加入“谜事”二字，且将英文名直截了当地敲定为“mystery”——城市是谜事的舞台——的原因；这也能解释为何在临近影片的末尾，在接连呈现了女孩的死亡

翻滚和对拾荒者的暴力击打后，姜烨选择给出了一段甜蜜温馨的室内长镜，仿佛在暗示：在偶然之下，美满的背后，死亡与暴力如影随行。每个人都可能偶然地吃到那颗由幸福糖衣包裹着死亡的水果硬糖。

比起精心设计的本格式谋杀，《浮城》中少女的死更接近于一次自洽的非正常死亡。之所以会选择“自洽”这个形容词，是因为事件里的每一个人都不过是在依据自身利益和情感行事。整个过程显得十分连贯与自然，死亡变得像是某种自组织系统的正常产出——每个人都不是凶手，每个人都又是凶手。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就此将凶手认定为这一事件背后的人际关系么？甚或于将它定义为“结构性的谋杀”？

于是，问题变成：这是一种怎样的结构？是谁的结构？在此，轻易就得出“城市生产偶然性死亡”这样的结论无疑是十分脱线的。显然，有人的地方就有死亡。我想，没有人能通过统计确证城市与偶然性死亡之间的关联度究竟有多高。唯一无法否认的，是这种城市与偶然性之间的关联性。并且，这种关联除了指向死亡，也还指向其他更多的面向。重要的是，这样的偶然性似乎很大程度源于人口的集聚，就像布洛克说的那样：纽约有800万人，就有800万种死法。在这当中，城市变成了媒介，在这种人口的集聚之上孕育和催生出各种错

综复杂的偶然。而这种催生和孕育的过程，或许才是娄烨在《浮城》中打算追问的真正谜题。

一次偶然的死亡，让我们偶然地察觉到了一块城市人际网络的碎片。我们并不清楚，在现实中，抑或在娄烨的镜头下，这样的碎片是以怎样的方式悄然流转于城市建筑中，串联起一个又一个的城市生活空间。如果正是这种潜隐的特质使得城市看上去如同浮于巨大的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我们或许可以说：每一座城，都是浮城。而娄烨之所以能成功拍出了南京与武汉的气韵，也恰恰在于他没有一味地把镜头留给城市建筑的表皮，而是选择在晃动中深深扎根于室内(interior)空间的诸种细节。

在《浮城》里，武汉是属于乔永照，陆洁，桑琦，蚊子，警察，富二代的；在《花》里，巴黎却几乎仅仅只属于“花”一个人。花在巴黎的几次搬家，在若干地点场合的性爱，在我看来更像是一次次地尝试和试探，想要看看究竟能通过怎样的方式——做爱时彼此的气息与味道，还是舒适便利的公寓，又或者是一个值得托付的恋人——去融入一座城，去找到一座城。一座让自己安心，能被称为“我城”的城。不幸的是，电影中的

“花”并没有找到，无论她面对的是巴黎还是北京。

生活中的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抱怨说不知道如何去接近，去爱一个人。殊不知，我们其实也并不是总是知道该如何去融入，去爱一座城。于是，我们才会看到电影中的“花”茫然黯然地往来于巴黎和北京之间，宛若漂浮于巨大的虚空(void)之中。无根的个体被各自巍然不动的城市实体衬托得轻微如凡尘。

在电影《花》里，我们看到的已不再是娄烨个人的故事或情绪，而变成了旅法作家刘捷或者是女主人公“花”的故事与情绪。只是，这种对于“我城”的追寻，依然是娄烨所擅长处理和表达——在我看来，《花》可以算得上一部十分整洁的娄烨作品——的个体与外部世界间的情绪对话。换句话说，是个体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其出发点依然是个体的。而在《浮城》里，娄烨才比较彻底地由个体走向了群像(这大概也是为何不少人认为《浮城》中人物刻画不够饱满的原因)，开始去处理一座城与一群彼此勾连的人之间的桥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经由《浮城》，娄烨才真正地由“自我”走向了“别人”/“他人”，由“我城”走向了“浮城”。



调和者蒋介石

——陶涵访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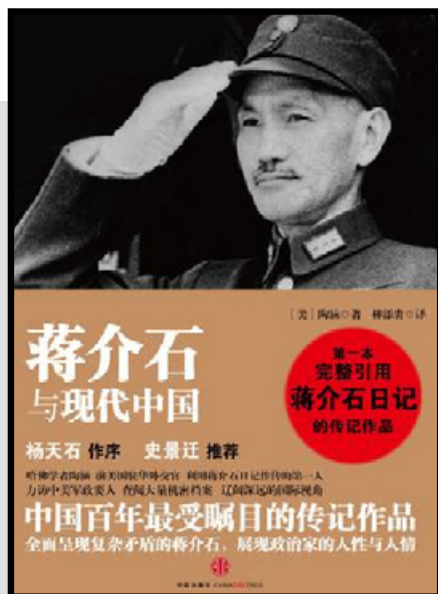
特约撰稿人 罗四鸽 (美国·波士顿, luosiling@gmail.com)

1960年代你曾三次见到蒋介石,你能仔细说说当时的会面情形吗?

那是1960年代早期。当时,我是年轻的外交官,被派到台北美国大使馆工作。我和蒋介石的几次见面都是排着队握手,没有机会认真观察他,当时宋美龄也在场。不过,那仍然是一个难忘的时刻,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和一个世界级领导人握手。当时,有一件事给我很深印象:蒋介石握手非常轻,不过可能是因为他得和排着长队的人握手问候。多年后我想,这或许能说明他的内向性格混杂着“A”型人的侵略性。

你当时对蒋介石是怎么评价的?我看到你在序言中提到伊罗生(Harold Issacs)的《中国革命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佩克(Graham Peck)的《两种时代》(Two Kinds of Time)、马尔罗(Andre Malraux)的小说《人的命运》(Man's Fate),以及杜希曼(Barbara Tuchman)的《风中尘埃》(Sand against the Wind),这些人的书对你的影响很大。这是不是西方(美国)人对蒋介石的普遍看法?

是的。那时我对他的印象大部分来自于这些书所描述的“标准形象”。这个形象不仅是学术界和新





闻界的普遍认知，也是我所知道的美国外交部中国问题专家们的看法。之前，我认为蒋介石是个没什么人品的独裁者，虽然他的清廉自律名声在外。他手里握有一大把好牌，却把中国输给了毛泽东。

你对蒋介石的印象什么时候开始有很大的转变？是写《蒋经国传》时吗？

1960年代初，当中国大陆的“大跃进”渐为人知时，我才意识到蒋介石在一件事情上一直是对的：他相信一种极端主义的乌托邦式改革已经占领了中国，而它必将失败。蒋介石从1940年代到1950年代在台湾的“白色恐怖”证实了他的独裁者名声。但我在台湾十年，去一些小城镇或农村参观时，可以看到蒋介石所进行的土地改革是成功的。台湾土地所有制问题一直是用一种完全和平的方式解决的。通货膨胀和腐败在早期得到了控制。在非共产主义的国家和地区中，台湾的收入差异是最低的。这些成功的基础经济和社会改革，以及一些代议制政治体系的萌芽，绝不能抵消蒋介石在台湾犯下的反人类罪行。但除了独裁的政治体制结构外，这些确实表明，一个有前途的中国现代化模式是有可能的。因此，在我写《蒋经国传》时，开始觉得西方历史中的蒋介石形象太片面。不过，我仍然认为一般知识分子对蒋介石的评价，本质上是对的。

你现在对蒋介石的总体评价是什么？

在为写《蒋介石传》收集资料1年后，我觉得他应得到更加复杂的评价。我在书中对一些众所周知的事增添了一些新的细节。在某些问题上，蒋介石会为自己辩护，认为自己有正当理由。为了生存和统一，他命令他的人民去战斗，为了赢得胜利不惜一切。就像杜鲁门和丘吉尔一样，蒋介石也知道他制造了一个道德包袱。我想说的是，他确实做了一些反道德反人类的事情，这是毋庸置疑的。其他一些次要的历史错误当然还有很多，但他在大陆和台湾的成就依然可以让他跻身“20世纪伟人”之列，这样的评价不是道德评价。在我看来，上个世纪中国的“伟人”有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蒋经国、邓小平。是的，蒋经国确实应该在此行列，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民主改革者。

能否谈谈蒋氏父子的异同？比如性格、个性、思想、执政理念等。

蒋介石是一位内向兼具权威性格的人。他有些沉默寡言，甚至冷淡。主导他的还是权威性格——他的坏脾气是出了名的，除了他的服从和忠诚外，很少有人称道的品质。同时，他还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在感到极其羞辱或悲观时，他会忍不住抽泣。在他那个年代的中国，他算得上是个浪漫的人——他会送花给夫人，在公共场合牵着她的手。此外，他还是个真诚的人，有时甚至是天真。毛泽东曾说他像鲁迅笔下的阿Q，很自以为是，身上有很深的传统中



INTERVIEW

国人的性格特点。

蒋经国外向、积极。如果他觉得有必要，他会对他的支持者长时间发火。有时他也让人难以相处，尤其在台湾早期，他主导了父亲的“白色恐怖”。他是个性格温和，在情感上容易和普通老百姓相通的人。

这两个人都是国家主义者，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两个人都很务实。比如蒋介石，当他得知1969年，尼克松与周恩来开始联系时，他像吃了黄连。他却什么也没说，没对美国也没对外说任何话。相反，他一直将维持台湾的稳定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以增加外国投资者和商人的信心。如宋美龄所说，蒋介石从来不了解民主。但是

他的现代化政策给台湾带来了快速的城市化、教育的普及以及家庭收入的增长，这些无形中为台湾自由的大众代议政府出现奠定了基础。也许，在生命的最后，他接受了儿子的信念：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成功最终会逼迫国民党政权做出一个选择——是真正民主还是更加严苛的压制。他去世前几年时曾说，自己的任务是创造一个现代繁荣的民主社会。这是他和一个美国人谈话时说的，这正解释了我的评价，但我怀疑他是否理解台湾社会变化的原动力所在。蒋介石并不信任美国人，根本原因是他认为民主让美国的外交政策在短期变化莫测。蒋经国喜欢美国，羡慕美国的民主。尽



图为晚年蒋介石



管早期他认为，对于这样一个貌似混乱的体系，台湾的条件还不成熟。实际上，他花了20年的时间来做出最后的决定。

通常印象，蒋介石在台湾几乎是一个独裁者，而你对蒋介石在台湾的25年执政评价颇高。

这个问题其实刚已经谈到过。在台湾，蒋介石最终建立起他在大陆从来没有做到的全面独裁统治。基本上，他在台湾开始了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包括一次高度成功且和平的土地改革。他还批准了一个一党制的当地代表政府，由此给非官方的反对党的出现给予了一定的鼓励和活力。腐败处于相对低的程度，而收入差异很小。都市化、教育的提高和经济繁荣所带来的影响都形成了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

台湾经历了五位总统：蒋介石、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再到如今的马英九，你如何看待台湾的变化和发展？

蒋介石虽然独裁，但在经济上有效地实现了现代化；蒋经国是转变了的专制者，他带来了自由的民主制度；李登辉则巩固了政治和经济进步。陈水扁符合中国一句古话“富不过三代”，这个第四代就像一个“败家子”，除了臭名昭著的腐败外，几乎一无是处，挥霍前三代人创下的资本。不过，历史可能会给出的论断是，他可能是最后一位推进台独的总统。目前为止，马英九的表现像是在试图做一个伟大的调解人，

巩固一个中国的原则，无期限结束台独的讨论。很明显，马英九有一个原则：台湾现状的根本改变必须得到台湾人民的同意。

你在书中给予了蒋介石很多正面评价，他是不错的政治家和外交官，你何以得出这个结论？你又是如何看待他的独裁和暴行？

一开始，我就提到了蒋介石的专制和暴行，我也说了蒋介石无疑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不管是世界范围内还是中国历史上。中国，或是任何其他国家的所有伟大人物的道德品质都是有争议的，蒋介石的成就无疑让他对得起这个称号。我们谈论起台湾取得的惊人进步或许说明了这一点。但他在大陆的23年，做了些什么呢？这些我在书里也都说了。举个例子：

1926年，蒋介石不顾他的苏联专家、共产党合作人的建议以及日本政府的警告，发动北伐战争，打败了军阀，正式将长期分裂的中国统一在一面旗帜下。同年，他在日记中写道，日本是中国的首要威胁，他要致力于从经济、军事方面长期建设中国。这些正如他在国内承诺过的一样。从1927年到1937年，伴随着起义和叛乱，蒋介石不仅要面对新的残酷的战争，日本的进攻，以及东北三省的沦陷、大萧条的影响和以及他对日本的让步所带来的普遍不满，尽管他是想实行他的新的自强政策。

如我在书里详细说的，他在维持国家稳定（他所控制的区域）、发展国家经济、实现国家货币发行、提高农村条件、为中国



向儒家的现代化迈进以及为接下来的恐怖战争的准备等方面，都取得着实的成功。

在与德国的合作中（用战略性的矿产资源换取武器设备和军事培训），他建立了相当大的现代军事力量，不过依然只有日本火力、数量的小部分。

1937年日本全力进攻中国，他进行了激烈的抵抗和英勇的撤退，政府、军队、相当部分的工业、大学、故宫等，都撤退到了内陆。3000万难民也跟随其后，差不多一个国家都撤退了。他修建了缅甸公路，并获得了苏联最终价值超过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实际上，他独自领导了中国抗日四年。根据共产国际文件记载，在那些年里，和共产党的军队相比，伤亡人员总数的95%是他的军队。1937年，他告诉他的将军们，太平洋战争将在四年内爆发。那个时候，他只有苏联的军事援助。他的核心战略是让美国也卷入战争——1939年9月后，丘吉尔也是这么优先考虑战略的。他知道苏联的援助很重要，最后他和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向共产党提供一个月10万美金的补贴。

1939年5月，他催促伦敦迅速和苏联结成一个防御联盟，因为如果不这么说的话，斯大林可能会和希特勒签署这样的条约。伦敦没有签，3个月后，苏联果真和蒋介石所预测那样做了。1941年4月，蒋介石私下对日苏互不侵犯条约表示欢迎，预测这个条约会导致日本袭击东南亚的同盟国。同年4月，他还警告罗斯福总统，希特勒不久将会袭击俄罗斯。事发前一两天，他同样

也告诉了周恩来，并请他警醒斯大林。

在说服罗斯福和越来越成为孤立主义者的美国人民认清希特勒对欧洲的侵略和日本对亚洲的侵略彼此关联的这件事上，蒋介石扮演了主要的角色。1939年末，他赢得了一笔关键的美金1亿美元的资助。1941年，他和丘吉尔一期劝阻罗斯福，不要放松美国日益增强的对日阵线。

他创建了中国自己支付飞行员和飞机费用的飞虎队。他成功地访问了印度，与甘地和尼赫鲁会面，赢得了他们许诺（并没完全遵守）不会直接干预英军对抗日本在亚洲的挺进。

他和美国结盟4年。在中国的两股力量中，和前四年一样，他的军队的伤亡率依然很高（超过了90%）。中国只收到美国借贷援助的3%，但中国继续牵掣了日本100万的军队以及约1000架飞机。在太平洋，日本卷入了更大的战场，蒙受了比西方盟国包括美国在内，更大的损失及兵力。

战争期间，他成功的迫使他国废除“治外法权”，终结了它们在中国城市（除去香港和澳门）的租界，例如上海。同时也废除了了过去100年来列强强加给中国的耻辱条约。他还成功让美国、英国承认西藏和新疆是中国的一部分。

此外，在联合国安理会中，他为中国赢得了一个永久席位，使中国成为世界事务的仲裁人之一。日本投降时，他号召中国人民不要对日本人民寻求报复，近两百万投降士兵和日本人被安全有效地遣返回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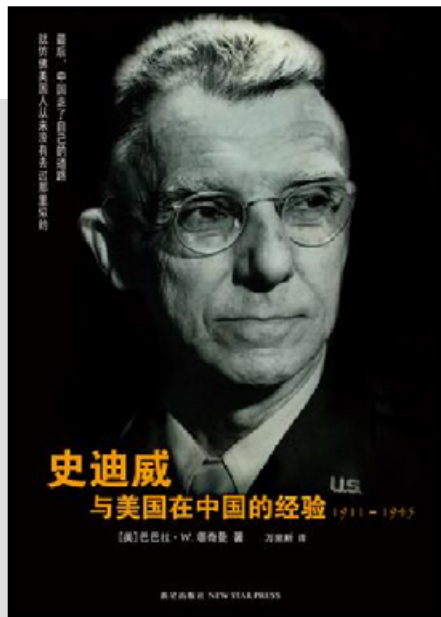
INTERVIEW

你对史迪威和马歇尔的评价很糟糕，你是否认为他们要对蒋介石在大陆的失败负一定责任？

不，我不认为史迪威和马歇尔对此有责任。蒋介石在抗日胜利日（1945年8月15日，笔者注）前夜写下的日记里对此说的很清楚。他认为如果内战时，苏联支持共产党，他打败他们的可能性很小。国民党政府在这场战争中赢得胜利的希望比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希望要小得多。蒋介石认为，他的主要任务是试图让斯大林明白，国民党政府的胜利对苏联来说不是一件坏事。美国是否会施加足够的压力，以阻止苏联间接但实质性地干预预料中的中国内部冲突呢？在这点上，蒋介石毫不乐观。

1945年8月，在莫斯科谈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期间，美国给国民党政府外交官发送消息，督促他们向苏联要求一个更有力的承诺，即不干预中国的任何内部冲突。可是蒋介石认为，斯大林即使签署保证，也依然会做他想做的事，所以最好不要激怒斯大林。但美国的调解让蒋介石相信，美国可能会对苏联的任何干预做出强烈反应。杜鲁门下令美国海军运输25万国民党军队到东北去，更进一步让蒋介石坚信，美国很可能愿意冒着与苏联交战的危险去阻止苏联对共产党的援助。

起初，蒋介石的策略有些激进——尽可能多的占领东北。但是苏联红军的蓄意阻挠让他再次对前景感到悲观。于是，他开始实行另一个计划，将力量集中在内蒙古



和中国北方一些有战略意义的地方。1945年11月中旬，艾尔伯特·魏德迈将军从华盛顿返回中国，告诉蒋介石，美国愿意援助39个师的重型装备，但如果内战爆发，这些援助将会停止。他警告，东北三省的未来完全只是中国和苏联之间的事。魏德迈私下（站在私人立场，而不是站在美国参谋长的立场）劝告蒋介石集中力量把握住长城以南的区域。11月中旬，在高级军官会议上，蒋介石宣布国民政府的一个策略是从东北三省撤退。尽管有如此计划，他给人的印象依然是他想呆在那里战斗。

令人讽刺的是，杜鲁门没有放弃罗斯福的目标——一个强大友好的中国。他派马歇尔来中国，做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调解人，试图让他们在民主联盟和结束战争上



取得一致。他确信，蒋介石将会被迫做出让步，但如果他没有，美国将继续支持他。马歇尔刚到达中国时，事情看上去似乎很有希望。马歇尔甚至领导了一个关于东北三省问题的委员会，委员会的决策对国民政府非常有利。然而几个月后《停战协议》便被打破了，周恩来让马歇尔相信，蒋介石的军队要对此负大部分责任。

当时，那支军队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蒋介石迅速重获信心。他开始相信，他可以守住并平定东北三省的南部，只留下北部少许给共产党。他希望以此缓解苏联的干预。当美国停止出售和运送武器时，蒋介石并没有重新考虑他的计划，反而继续推行。他相信，在东北的战役将会决定整个战争的结果。于是，他投入了越来越多最好的部队到这场战役中。同时，他也开始计划从大陆撤退到台湾。1948年初，他下决心从东北撤退时，该区域的指挥将军卫立煌，很明显倒戈相向了，拖延了好几个月的撤退时间。到那时，已经太晚了。其结果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共产党来说，是惊人的胜利。

你认为周恩来与蒋介石一直有秘密联系渠道吗？你对周恩来怎么评价？

这两个人无疑维持着秘密的不定期联系。首先是1954年的金门事件和1958年的金门炮战。另一个众所周知的联系始于1969年，周恩来通知蒋介石，尼克松和共产党领导人秘密联系。

书最后，你将蒋介石与毛泽东进行了对比，你认为最后胜利的是蒋介石。为什么？

专制制度是不可能带来良性或是富有成效的社会模式的。蒋介石的想法有些像邓小平，是一种现代儒学思想。他们都希望建设一个富有成效、繁荣、统一强大的中国，恢复其世界影响，得到世界尊重。两个人都相信要实现这个目标，国内的稳定和一个管制（也就是控制）很好的社会是必须的。他们也都希望，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国向世界开放，在政治领域外，人民享有个人自由。他们相信，自由市场是最佳的实现他们目标的政经方式，而这种自由市场也包括了在强有力的政府监管下的国企竞争。正是这种现代儒学愿景，激发了蒋介石，也让邓小平的继任者继续推进大陆令人惊讶的现代化。

蒋介石曾于1946年在大陆通过宪法草案，这部宪法草案呼吁民主，呼吁一个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以及其他主要民主权利的代议政府。到了台湾后，尽管这些权利被搁置一边，但蒋介石继续承诺这些权利会最终回归。同时，他批准了省或地方的政治选举制度，这种选举制度让许多真正的反国民党的地方政治家得以崛起，最终形成党外的反对团体的基础。所有这些都为蒋经国的民主化铺平了道路。

另一方面，在大陆，富有意义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希望远远小于同时期的台湾。台湾和美国的紧密联系也是其得以进行改革的一个因素。今天的中国，缺乏这样的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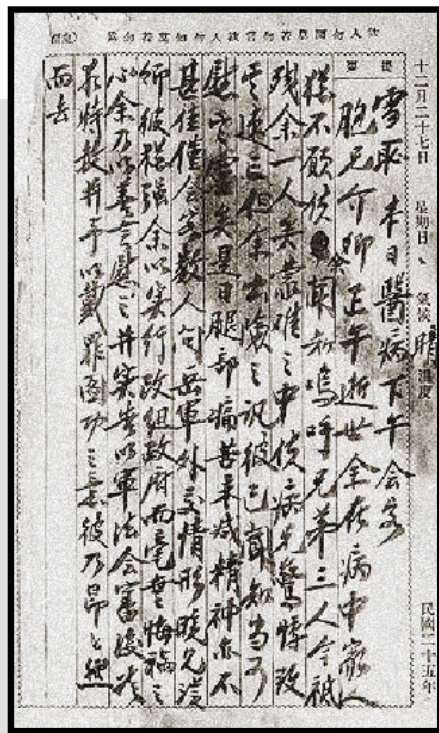
英文版扉页，你引用了孟子的一句话：

孰不为守？守身，守之本也。传记第一章将蒋介石定位新儒家青年，这是一条贯穿始终的线。此外，你还指出蒋介石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也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信徒，这些如何在蒋介石那里得到调和？

从严格的自我教化和自我提高原则看，蒋介石是一个新儒家。他相信一个好的统治者必须是智慧和坚强的，但如果人民或是国家的利益需要，统治者有必要残忍。同时，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真挚也是一个好的统治者应具备的。蒋介石相信，基督教教义的爱和儒家所强调的人道或是人文主义并行不悖。基督教“爱”的教义强调每个人需要认识自己的罪，与儒家强调的自我反省一致，两者可调和。对蒋介石而言，儒家的服从、和谐、稳定和务实观念，加上孙中山的改革理想与“训政”主张，构成了他的核心理念。

除开政治家蒋介石外，你还写了一个“凡人”蒋介石的许多细节，你是如何看待这个凡人蒋介石的？

百分之九十五的时候，蒋介石穿的很简单，一般是没有军衔的制服或黑色绅士长袍，头戴一顶软呢帽。在后来的日子里，他穿得像一个谦虚的学校老师。30岁之后，他很少喝酒，常常喝热白开，在台北之后会喝可口可乐。他吃简单的宁波菜，即使在宴会上也是如此。他读唐诗、孟子，也喜欢美国电影。正如人们注意到的，他会拉着



图为蒋介石日记手迹

夫人的手。他似乎不在意外甥女兼助手是个穿异性服饰的女同志，而外甥女也和他们一起生活吃饭。他很享受和孙儿们在一起的时光，他们大多数是欧亚混血儿。

在极少数的场合，他会忍不住抽泣。他有脾气，年轻时是个坏小子。但人到中年，在非正式场合拍下的照片里，他的脸上有温和的微笑。在台湾，很明显，他更喜欢自己那个慈祥老人的形象——这个形象就是我们在台币上看到的面容，他微笑地看着我们，背后是台北中山公园里他的大雕像。

这是第一本引用《蒋介石日记》的传记吗？



是的，这本书第一次使用了蒋介石53年所有的日记。这些日记当然很重要。我开始写这本书时，我知道它们马上会对外开放。如果不是这样，我不会开始写这本书。开始时，我参阅的是摘录的日记，这是国民党历史办公室从蒋介石的日记、书信、回忆录和讲话中收集起来的12册资料集。原始日记开放后，我一一对照、检查了这些摘录的日记。这些日记的检查花了几千个小时，主要是斯坦福大学的中国学生助手帮忙做的。

自1915年起，蒋介石开始写日记，一般在每天清晨时用毛笔以较工正的行体书写，除西安事变和因病住院期间外从不间断，直到1972年7月21日因手疾停止。其中1915、1916、1917和1924这四年已佚，存世的前后54年，共63册。这么多日记，你都看了吗？蒋介石的日记是用毛笔写的，且多文言，没有标点，即便是现在的中国人看都比较难，而且胡佛研究院只允许对日记进行抄录，不许复印抄录，你是怎么克服这些困难的？

我不像过去那样能阅读中文了，我从来都应付不了繁体字，尤其是毛笔字。实际上，大部分翻译工作是一些能读繁体字的中国学生助手做的。我给我的助手们详细的指导，让他们明白什么是需要翻译的。我会列出一些主题，比如宋美龄、共产党领导人，美国、日本、战争等，要求他们翻译所有关于这个主题的日记。有时，我会要求不同的助手核对这些助手的翻译。

你是怎么评价这些日记？

无疑，这些日记都是蒋介石自己写的。像许多历史人物的日记、书信、回忆录……它们提供了一个作者本人的视角。这些日记，且大多是写给自己的日记，大都在讲他们自己，他们的个性、性格，梦想以及其他事情，包括谈话或论辩时他们的立场。

无论之前的《蒋经国传》，还是这本《蒋介石传》，最为人称道的是资料。据说，你在写《蒋经国传》时，运用了“资讯自由法案”（FOI），要求美国中情局（CIA）、国防部、国务院等部门提供涉及蒋经国尚未解密的文件，这是真的吗？

是的，写这两本书时，我确实都用了“资讯自由法”要求得到一些外交电报、CIA情报和其他机密报告。程序是这样：发一封信到相关机构，上面写明你要寻找的相关资料的主题和日期就可以了。有时，会收取一些必要的寻找费用。具体细节我有些忘了。我相信其他政府今天也和美国一样，实行资讯自由。当然，最近很多文件维基解密比FOI抢先一步，但我需要的没在其中。

在写《蒋介石传》时，你还查阅了美国国家档案保存的若干中美政、军要人，如宋子文、马歇尔、史迪威、魏德迈等人的文献。这些珍贵资料对外公开吗？

美国国家档案馆不在华盛顿，在马里兰州大学帕克分校。每隔一段时间美国国



INTERVIE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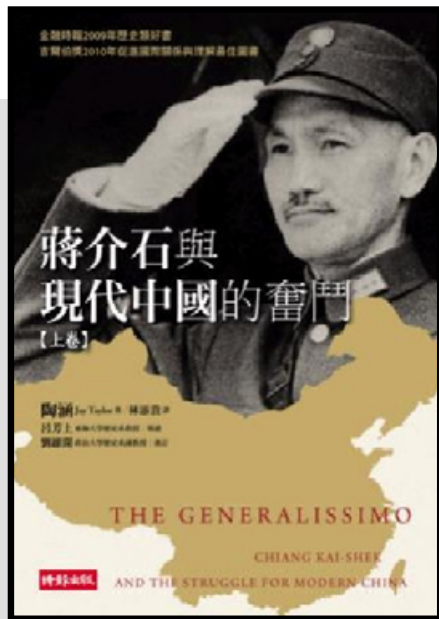
务院和其他政府机构便将所有的机密文件送到这个档案馆。每年，国务院会出版几册三十年前的每个大国或地区的外交电报以及一些白宫、CIA的文件。例如2002年出版了尼克松，基辛格与北京在1969—1972年间的白宫记录。宋子文和史迪威的文件则是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里找到的。

你的外交官身份是不是为此提供了许多便利？

我认识很多处理中国事务的美国外交官、军事官员和CIA官员，也认识一些台北官员和北京官员。我采访了很多老朋友老熟人，他们常常又建议我采访其他人。我在美国外交部工作37年，大部分时间是报告有关中国的政治事务。这为我写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背景，以及分析和写作技巧。

你采访了很多，能说说几个采访的小故事吗？

我要求采访时，大多数前国民党政治和军事官员都愿意接受。我通过一些中间人，在台北采访过蒋纬国一次。我忘了中间人的名字了。很明显，蒋纬国嫉妒他的这位义兄，认为蒋经国故意挫败他的事业，让他不能提升到高级领导人行列，也不可能政治上对他进行挑战。1988年蒋经国去世后，蒋夫人实际上试图让蒋纬国做新的国民党领导人，但没有成功。至于郝柏村，我



图为《蒋介石传》台湾版

记得我在台北的助手给他的办公室打过电话，安排了一个采访。就是他告诉我，蒋介石是多么恨尼克松。

写《蒋经国传》时，蒋经国生命中两位极其重要的人拒绝接受访问，一是蒋经国的夫人蒋方良，另一位是李登辉。为什么？

我认为，蒋方良是一个天生害羞的人。据我所知，至今为止，她从未接受过任何采访，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宋美龄也不接受任何采访。

《蒋介石传》英文版出版的时候，蒋介石日记还未完全公开，这影响你的观点吗？

我不这么认为。2008年下半年，当这本书拿去出版社时，蒋介石最后一批日记



依然没有开放，我们在2009年才得以看到这些日记。我很高兴看到这些最后公布的日记没有改变我在第一版中进行的解释和假设。在之后出版的平装本的附言中，我对这些日记进行了说明。

《蒋介石传》的台湾版和大陆版有区别吗？

对于简体版，我同意了极小的删除，但至少98%的内容要和英文最终版的内容一样。修改不像删除那么明显和重大，比如说用“台湾当局”替代“中华民国”的说法。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他们有机会读到他们从未读到过的另一个版本的历史。或许有些人不同意我所列举的一些事实，或是我对一些事件的解读。但这应当引发出一个健康的讨论，并有助于寻找真相。Q

布达佩斯访“恐怖屋博物馆”

特约撰稿人 邵浴日(上海, taiyuri1984@gmail.com)

谨以此文献给每一位热爱自由的匈牙利人。

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安德拉什大街向来都是游客们趋之若鹜的景点。这条笔直的林荫大道连结了布达佩斯的市中心与著名的英雄广场,街道两边坐落着具有新文艺复兴风格的公寓建筑,它们各自具有独特的立面及室内设计,构成市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这条大街上,还坐落着诸如匈牙利国家剧院、李斯特故居以及老音乐学院等诸多著名历史建筑,一些别墅亦被选作别国驻匈牙利的大使馆。鉴于其所具有的历史文化价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2年将其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在这条大街的正下方,是欧洲大陆上的第一条地铁,它于1894年完工,至今仍在运行。

然而我们今天所要探访的这幢建筑,却与上述的美好与辉煌无关,它有着一个与这条街道所具有的浪漫色彩格格不入的名字——“恐怖屋”(House of Terror)。这幢位于安德拉什大街60号的灰色建筑,是一栋地下一层、地上四层的砖瓦结构楼房,建于1880年,原

先曾是一栋贵族的私宅。1937年,匈牙利的纳粹组织“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开始租下这栋建筑的部分房间作为办公室,其后一家名为《团结》的极右派报纸的编辑部也搬了进来。接下来事态的发展便使其逐步成为了一幢名副其实的“恐怖屋”。



“恐怖屋”的由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匈帝国因为战败而解体。根据特里亚农条约，匈牙利失去了战前三分之二的领土，超过三百万的匈牙利人也由此置身在了邻国的统辖之下。匈牙利是一战中损失最大的国家之一，也因而成了中欧地区最为弱小的国家。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极右翼的民族主义思潮在匈牙利就跟在德国一样易于盛行。在匈牙利1939年的议会选举中，标榜“国家社会主义”的箭十字党(the Arrow Cross)成为议会第二大党。它的党员超过30万之众，得到将近100万选民的支持，在首都布达佩斯蓝领阶层占主导的选区里，每三票中就有一票是投给箭十字党的。而安德拉什大街60号也进而成为箭十字党的主要活动中心之一。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以摄政王霍尔蒂(Horthy)将军为首的匈牙利政府选择了希特勒德国这一边，并期望能够在德国的帮助下通过参战来夺回在一战中失去的土地和人口。1941年，匈牙利对苏联宣战，并且立即参与了德国在苏联领土上的军事行动，向德国提供了几个军的兵力。

但到了1944年，当德国显露出败迹的时候，霍尔蒂曾有意使匈牙利退出战争并与德国断交。这导致他于当年3月18日被德军“邀请”至德国，乘着他不在于国内，希特勒在第二天即3月19日

便发动了对匈牙利的武装占领，约25万德军越过边界开进匈牙利领土。此后虽然霍尔蒂仍担任着摄政王的职位，但最高权力实质上已落到德国驻匈牙利的帝国部长埃德蒙·费森迈耶(Edmund Veesenmayer)手中。至此，匈牙利已完全处于纳粹德国的统治之下。

1944年9月，苏联军队已经攻入匈牙利领土，德国的败势已不可逆转。此时的霍尔蒂又做出了最后一次使匈牙利退出战争的尝试。他于8月29日解散了以斯托尧伊·德迈(Sztójay D·me)为首的政府，用自己的心腹拉卡托什·盖佐(Lakatos Géza)将军取而代之，并命其派出一个秘密代表团赴莫斯科商谈停战事宜，以商定匈牙利投降的相关条款。然而霍尔蒂的这一努力又被纳粹德国给阻断了。德军对他实行了“保护性羁押”，并扶植起以箭十字党为首的傀儡政权，其头目萨洛希·费伦茨(Szálasi Ferenc)成了名义上的匈牙利领导人。因为坚信希特勒的神秘武器即将问世并将扭转战局，箭十字党人在掌权后还将大批的未成年男子送上战场与德国人并肩作战，并对境内的犹太人进行疯狂的迫害。支撑这一切罪行的一个重要机构便是当时的政治警察部门，任何敢于不服从乃至反对箭十字党政策的人，都会面临被政治警察逮捕、关押、审问以及施刑的危险。而此时的安德拉什大街60号恰恰正是政治警察部门的总部所在，在箭十字党

掌权的短短几个月里，就有数百人被带到这幢大楼的地下室中被施以酷刑。

苏联军队于1945年2月13日占领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并于同年4月4日“解放”了匈牙利全境。一个月后，苏军攻克了德国首都柏林，盟军迫使德国投降。根据协议，战争结束后苏联军队“临时驻扎”在匈牙利。当时也许没有人会料到，苏军这一呆就是将近半个世纪，到最后一批苏军撤出匈牙利领土的时候，已是1991年6月19日了。

在匈牙利共产党人卡达尔·亚诺什（Kádár János）于1945年初刚被任命为布达佩斯警察局副局长时，苏联秘密警察机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就以“顾问”的身份随同苏军来到了布达佩斯。而当时随着苏联坦克一同进入首都的匈牙利共产党组织的首要任务之一，便是尽快夺取安德拉什大街60号。在对建筑和设备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之后，匈共的秘密警察机关便被设在了这座大楼里。这一机构最初叫作政治警察局（PRO），后被改名为国家保卫处（AVO），属内务部管辖，1950年1月被正式定名为国家保安局（AVH），并脱离内务部成为一个独立机构。但无论名称如何改变，其始终都是一个负责执行政治恐怖的政治警察机关，并完全凌驾于普通警察机构之上。当时普遍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说是国家保安局的一名下级军官就能顶得上一名警察上校，足见其在新政权中所拥有的重要地位。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在秘密警察部门宣称自己的首要任务是搜捕法西斯分子的同时，许多箭十字党掌权期间的旧警察和纳粹军官却受到了新政权的重用。这是因为，他们在旧政权下练就的那套抓捕、审讯和拷打犯人的本领在苏联顾问的眼中成了十分宝贵的“专业技能”，因此这些人便成了建设新政权的“有用资源”。当局规定这些人只要做出改变政治信仰的声明之后便可以编入政



治警察局，继续从事他们的老本行。而他们当中也很少有人会拒绝苏联人的这种赏识。就这样，不仅当年纳粹政治警察的总部如今成了共产党政权秘密警察的总部，许多以往就在其中工作的纳粹政治警察竟也摇身一变成了共产党秘密警察的成员！

正是基于这一历史的巧合，如今这座位于安德拉什大街60号的独特建筑被改建成了一座历史博物馆。而基于它的历史所蕴含的独特气质，以及它以往给人留下的挥之不去的印象，这座博物馆被形象地命名为——“恐怖屋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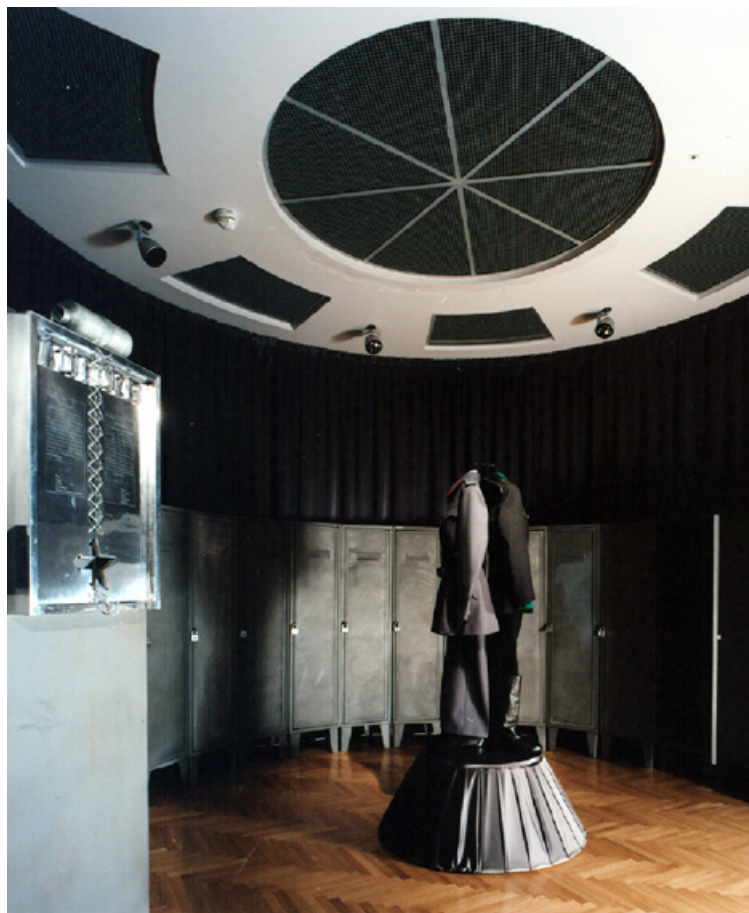
“双重占领”与“更衣室”

走进博物馆的大门，迎面便是两座显眼的大大理石碑，黑色的那块上面镂空雕刻着代表纳粹的箭十字党党徽，红色的那块上面则刻着代表共产主义的五角星。在那两个镂空标记之下则分别刻着几个匈牙利语单词，分别意为“纪念在纳粹/共产主义恐怖统治下的受难者们”。

博物馆的参观路线从三楼开始。首先来到的便是一个叫做“双重占领”的展厅。顾名思义，这个房间展示了两大强权对于匈牙利的先后占领。房间的中央有一堵展示墙，两边各有四台液晶显示器，一边播放着纳粹德国的发展史及其对于匈牙利的占领，另一边则播放着苏联占领匈牙利、以及其后共产主义阵

营的相关影像资料。展厅四周墙上的照片则展示着这场战争给匈牙利带来的巨大破坏，其中包括一幅布达佩斯的象征——横跨在多瑙河上的赛切尼链桥被德军炸毁后的巨幅照片。

仅仅是“双重占领”这四个字本身，其实就已经饱含了足够的悲剧意味，再加上看了如此丰富的图文影像资料，真令人不禁感叹匈牙利民族的不幸。但是，仅仅是外国占领本身，也许还并没有那样可怕。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占领政权本身的性质，及其给被占领国带来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就拿匈牙利来说，其实直到1944年3月纳粹德国出兵占领之前，匈牙利的国家权力都仍然掌握在一个合法的民选议会和政府的手中，而议会大厅中坐着的也不仅是执政党的议员，其中也一直活跃着诸多反对党议员的身影。除了一些战时的限制规定之外，匈牙利社会仍然享有基本的言论出版自由。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当时的匈牙利人享有着比邻国居民更好也更自由的生活（奥地利早在1938年就被并入了纳粹德国）。但在3月19日德军进驻匈牙利之后，一切都随之改变了。匈牙利原有的选举制度、议会、司法独立、言论自由都被一一取消，反对党派也被完全取缔，当然这并不出人意料，因为在纳粹德国，这一切早就被彻底取消而不复存在了。

而当苏联占领匈牙利之后，除了最初两年里因实行所谓的“联合政府”路线而政策略有放松之外，可谓完全继承了纳粹德国所留下的政治“遗产”。新政权的作为在很多方面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仍以安德拉什大街60号为例，在纳粹统治时期，其政治警察部门还只是占据着这一幢建筑，但当共产党的秘密警察部门搬进来之后，便开始了急剧的扩张，不久之后，这个部门竟已占据了整整一个街区！那些毗邻大楼的原有使用者被一一请出，许多房间都继而被改作国家保安局的办公室；同时，这些建筑的地下室隔墙也被一一打通，于是，在整个街区的下方便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迷宫似的地下监狱网！

原有的暴政并未随着统治者的变更而有所缓解，反而愈演愈烈，想来这才是匈牙利民族最为不幸的地方吧！三楼的另一个展馆则非常形象地表现了这一不幸。这个不大的房间叫做“更衣室”，在其中中央背对背站着两个人形模特，一个穿着纳粹政治警察的黑色制服，另一个则身穿国家保安局的灰色制服（后改为蓝色）。但是如前文所述，许多以往的纳粹政治警察都得以留用，他们已摇身一变成了如今国家保安局的得力干将了。所以听起来也许十分吊诡——这背对背身代表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识形态、截然对立的两大强权的不同制服的两个人，其实很可能就是同一个人！果然，如果你朝墙上那个正在播放影片的显示屏望去，便会看到旧政权的那些警察和军官们如何在“更衣室”中脱去“旧衫”，换上“新装”，再昂首阔步地走进了新的时代……

当然，这个“更衣室”还含有另一层寓意——政权的变更也意味着整个匈牙利民族都需要换上一身新装，进入一个新的世界了。在那个世界中，他们会穿着与以往不同的制服，戴着与以往不同的徽章，说着与以往不同风格的语言……但或许，一切又都没有改变？

“古拉格”

事实上，匈牙利领土上的红色恐怖早在国家保安局成立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苏联在1919年建立起了劳改集中营制度，这便是如今已恶名昭著的“古拉格群岛”。而在1939年，即二战初期的时候，苏联就设立了所谓的“战犯拘禁督察局”（GUPVI），该机构专门负责运营那些关押外国人的“古拉格群岛”。苏联当局此举的目的在于从红军占领区运回所谓的“战犯”，将其关在集中营中进行强制劳动以弥补苏联自身劳力的不足。苏联国防委员会于1944年12月16日做出一项决议，宣布要对占领区的那些身强力壮的德国居民实行“动员”，即要将他们大批运进苏联的劳改营。但当时匈牙利的苏联占领当局常常发现当地并没有德国居民，而 they 又受命要交出一定数额的“战犯”。于是为了完成上面下达的指标，他们便首先挑那些带有德语发音名字的匈牙利人进行抓捕，继而也开始抓捕那些有着匈牙利语名字的居民了。在仍未能完成指标的情况下，他们甚至将魔爪伸向了未满18岁的少年和年逾花甲的老人……

除了需要劳力的经济因素，政治因素也是重要的考量之一。苏联国家安全部门以抓捕“战犯”的名义，在其占领区将那些在他们看来会对共产党的统治产生潜在威胁的人员一概实行了抓捕。这一过程在二战后的匈牙利得到了延续。国家保安局所实行的政治恐怖便是从清除过去的“反动分子”开始的。在搜捕法西斯分子的名义下，许多人未经正当的法律程序便遭到逮捕和监禁。一大批过去

的政府官员、军官、牧师、工厂主、银行家以及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如律师、医生等都被没收了财产赶出首都。他们留下的公寓和别墅很快便被那些“仕途正盛”的共产党干部们给一一填满。那些被发现怀有不同政治见解却又无法给其罗列罪名的人则被送进了劳改营。此外，还有大批居住在临近南斯拉夫边界的“阶级异己分子”也被强制举家搬迁到东北部荒凉的霍尔多巴吉草原居住。据统计，在当年劳改营非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下，共有将近30万匈牙利人失去了生命。

三楼这个叫做“古拉格”的展厅讲述的就是关于苏联劳改营的故事。展厅的整个地毯是一张巨大的苏联地图，上面标出了当年所有劳改营的位置，而那些集中关押匈牙利人的劳改营，在地图上更是用显目的红点标示了出来。墙上的显示屏正在播放当年幸存者的采访，向今人诉说着曾经的苦难与不幸。展厅里还摆放着十多个展示柜，里面陈列着当时劳改营囚犯们所使用过的个人物品，包括靴子、水杯、信件和十字架等等。

“五十年代”

二战之后，斯大林并没有急于在苏占区的东欧各国实行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是采用了建立“联合政府”的过渡政策。在1945年举行的匈牙利议会选举中，具有悠久历史和良好声誉的小农党赢得了

57%的选票，共产党尽管享有苏联占领当局的明确支持，最终也只得到17%的选票。但是以苏联为主导的联合占领委员会并没有完全遵照选举结果，允许匈牙利成立一个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府。经过努力，苏方最终为匈共在新政府中争得了3个部长职位，其中就包括了内务部长这个重要职务。共产党的首任内务部长是纳吉·伊姆雷(Nagy Imre)，但他几个月后就被匈共中央认定为“过于宽厚而不适合内务工作”，从而改任国民议会议长。其后接替他的拉伊克·拉斯洛(Rajk László)正是利用这一职务之便，不仅掌控了整个警政系统，更是将刚刚成立的

秘密警察机构——政治警察局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以此为基础，匈共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便得以不择一切手段来逐步登上全国最高权力的宝座了。

匈牙利的第二次议会选举于1947年8月举行，这便是匈牙利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蓝票”(Blue Ticket)选举。在这场选举中，数十万匈牙利公民被剥夺了选举的权利，在内务部长拉伊克·拉斯洛的领导下，共产党还伪造了20万张选票，另有近70万张有效选票被予以销毁，这才使匈共的得票数得以“领先”，从而将左翼政党联盟扶上了执政舞台。但即便如此，共产党在临时选举中也只得到了区区22%的选票。

前文已经提到，国家保安局所打击的目标显然不只限于所谓的“反动分子”。为了对政敌进行压制和打击，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匈共掌控下的国家保安局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不断地制造着政治冤案。反对党的领导人们受到一系列的政治迫害，他们要么被迫流亡海外，要么就被投入监狱。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也被迫于1948年6月与共产党实行合并，合并后的新党叫做“匈牙利劳动人民党”(MDP)。这一合并实质上意味着社民党的彻底消亡，因为整个新党完全是以共产党为主导的。之后，原社民党的领导人便被相继投入了监狱，其重要成员也大多未能幸免。到了下一次1949年春天的选举，选民们终



于发现，除了共产党的候选人之外，他们已经无人可投了。在选举的过程中，共产党还发动了20万名所谓的“人民教育家”到全国各地进行“选民教育”。国家保安局更是负责实行全程的监督与保障。这一次，共产党终于囊括了96%的选票，获得了全面的胜利。下一次的竞争性议会选举，则要等到41年之后了。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被认为是匈牙利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段时期。据统计，在1948年后的清洗中，匈牙利共有100人被处决。到1953年纳吉·伊姆雷首次出任总理时，各地关押的犯人数目达15万之多。至少有占全国总人数1.5%的人曾因某种捏造的罪名被当局逮捕。当时的社会氛围一度到了风声鹤唳的程度，不少人在夜间听到家门前的街上有汽车停下的声音就会心惊胆战，害怕被警察抓走。在博物馆二楼的一个叫做“安置与流放”的展厅当中，就停放着一辆当时秘密警察用以夜间抓人的黑色轿车，轿车四周还环绕着一层半透明的黑纱，整车的面容只隐约可见，更是增添了一份神秘与恐怖的气氛。

在那个年代，尚未遭到清洗的人也并不感到轻松。当时社会上告密之风盛行，窃听已成为当局掌握人们思想动态的主要手段，甚至大部分的领导人都被实行了窃听，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当局的监视。这一点在三楼这个叫做“五十年代”的展厅中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展厅

的中央放置着一个华丽的社会主义风格的主席台，主席台后面的屏风上自然是挂着列宁、斯大林、以及当时匈共最高领导人拉科西·马加什（Rákosi Mátyás）的画像，但是当我们绕到屏风后面，便会看到一整套的秘密监听设备——原来，主席台上的领导人看似高高在上，其头顶也时刻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皮特的房间”

“恐怖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展厅莫过于“皮特的房间”了。皮特·加博尔（Péter Gábor）是当年的国家保安局局长，看来我们有机会一窥大楼主人的办公室了。还未进到展厅，房间大门上的那个金属铭牌就吸引了笔者的目光，上面刻着皮特的全身像，但却具有“阴阳”两面——左半边的皮特西装革履、春风得意，右半边的皮特则是赤身裸体、狼狈不堪。还未来得及思索其中的寓意，笔者便又被整个房间的“阴阳”风格所吸引——说这是皮特当年的办公室，明显只对了一半，因为这个房间以中间为界，两边分别被装修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这一边从天花板到墙壁再到地板，都是一片令人愉悦的暖色，天花板上有精致的雕花，墙壁上有几何形的装饰，显得优雅而温馨，再加上实木雕花的办公桌椅，桌上摆放着电话、钢笔、文件等办公用品，让人一看便知，这是局长的办公室了；但这个房



间的另一边，从上到下却只有令人压抑的黑色，仅有的摆设是一把简单的木椅和一张冰冷的铁床，不仅跟刚才那一半的局长办公室很不搭调，简直就像一间监狱嘛！在进一步了解了皮特的故事之后笔者才知道，原来，它真的就是一间监狱！

从1950年开始，党内的清洗运动也开始落到了负责执行清洗行动的机构——国家保安局的头上。许多局内原来的得力干将，如今也——身陷囹圄。而同样的命运最终也落到了机构的负责人——皮特的头上。1953年1月，在斯大林掀起社会主义阵营内新一轮反犹高潮的背景下，拉科西便毫不犹豫地将具有犹太人血统的皮特及其数十位同僚投入了国家保安局的地下监狱。拉科西此举并不令人意外，一方面皮特多年的辛勤“工作”已经累积了太多民怨，另一方面皮特几乎亲身参与和见证了匈牙利“解放”之

后的所有重大政治事件，掌握了太多的秘密。因此，拉科西恰好可以借着平息民愤的名义来消灭掉这个党内的潜在威胁。

值得一提的是，在如今这幢大楼的地下室中，就复原了当时的地下监狱以及所谓的“惩罚室”。政治犯们夜间会被带到楼上进行审讯，平时就被关在这里。关押的条件十分艰苦，囚犯们只能睡在潮湿的木板床上，有时甚至是直接睡在地上。每人每天只供应一顿饭，一般是一杯豆子汤加上150克面包，总热量只有490卡路里。逼供的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他们不仅会受到严刑拷打，还会受到各种精神折磨——也许长时间不准他们睡觉，或者一会儿把他们带到死一般的沉寂当中、一会儿又把他们放到难忍的噪音中去，以扰乱他们的神志。笔者见到其中一个“惩罚室”的四壁还包裹了装有填充物的沙袋，显然是为了防止犯人因痛苦不堪而自杀的。面对当年的地下监狱，参观者可以走进当中任何一间，身处其中，想象大门“砰”地一声关闭，感受那份切实的毛骨悚然。

一边是豪华的首长办公室，另一边就是阴森的酷刑监狱。类似的情节在当年的匈牙利并非仅是皮特一例。前文提到的匈共内务部长拉伊克·拉斯洛为了能够亲自督查他所负责案件的侦办进展，就曾频繁地造访过安德拉什大街60号。这位信仰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在其任内清除法西斯分子以及打压对付反对党等工

作上可谓不遗余力，甚至连在战时救过他命的哥哥拉伊克·安德烈都被判了死刑。但由于他是匈共“本土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声望又对“莫斯科派”的领导人拉科西产生了威胁，于是便成了拉科西的清洗对象。拉伊克在1949年5月20日被逮捕，在狱中受到了自己以前下属们所施行的刑讯逼供。这一切对他来说也许并不陌生，只是这次是用到了他自己身上。他在其后著名的“拉伊克叛国案”中被判处死刑，并于10月15日被执行了绞刑。同时被判处死刑的还有他的四位高层同僚。

早在拉伊克被捕的几个个月前，他就被免除了内务部长的职务而改任外交部

长。其内务部长的职务由“本土派”的另一位重要领袖卡达尔·亚诺什接任。但是，其“本土派”的身份也已然注定了他将成为拉科西的下一个清洗对象。卡达尔于1950年6月被解除内务部长的职务，次年5月被捕。而直接负责整个逮捕行动并将其投入监狱的，正是时任国家保安局局长的皮特·加博尔。而最为吊诡的是，卡达尔恰恰就是当年这个机构的创始人！

在经受了严刑逼供之后，卡达尔被判处无期徒刑。他在狱中被打掉牙齿，与世隔绝地度过了三年半的时光。在被单独囚禁的漫长岁月里，他没同任何人交



谈过，出狱的时候几乎丧失了语言能力。后来他曾对一位朋友这样说道：“霍尔蒂和盖世太保统治时期的监狱是够坏的了，但是与拉科西统治时期的监狱中所受的折磨相比，就根本算不得什么。”

接替卡达尔内务部长职务的人名叫泽尔德·山道尔(Z·ld Sándor)。这位文质彬彬的内务部长已经从自己的两位前任身上看到，在这个职位上，既可以审讯别人，也容易落到被别人审讯的境地。当他觉察到自己很快将成为接连被捕的第三位内务部长时，为了免除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他竟主动选择了自我毁灭的道路。当天夜里，泽尔德与其夫人、岳母以及两个孩子共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第二天上门逮捕他的警察们面对的只是五具已经僵冷的尸体……

类似的例子当然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该展厅墙上的显示屏就循环播放着所有那些受害领导人的照片和简介。**他们昨天还是施暴者，今天就成了受害者；昨天还是坐在楼上办公室里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秘密警察头子，今天就成了关在地下室牢房里接受刑讯逼供的囚犯；一边是天堂，另一边就是地狱，而在缺乏对于个人权利实行有效保障的制度安排的情况下，尤其是在秘密警察横行的社会里，其实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安全的，天堂与地狱之间，往往也只有一线之隔。**我想，这就是“皮特的房间”所带给我们的启示吧！

“1956年革命”

随着1953年3月斯大林的去逝及之后赫鲁晓夫的上台，苏联在外交上试图与西方国家达成某种缓和。其最具代表性的举动之一便是于1955年同其他西方国家占领当局在维也纳共同签署了《奥地利条约》，该条约规定奥地利从此成为独立的中立国，各国占领军一律撤出奥地利领土。然而匈牙利却陷入了与奥地利截然相反的境地，就在《奥地利条约》签署的前一天，以时任总理赫格居什·安德拉什(Hegedüs András)为首的匈牙利政府签署了《华沙条约》，这便为苏军继续在匈牙利驻扎提供了法律基础。果然，苏联从奥地利撤出的特别部队竟也顺势驻扎到了匈牙利的领土之上！

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的罪行进行了全面的揭露，东欧各国国内要求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这一年的10月23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在秘密警察向示威群众开枪之后，这一运动更是演变为一场公开的全民革命，其核心诉求便是要求政府进行实质性的改革，以及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匈牙利国家。这次革命可被视为匈牙利社会各阶层对于以往社会不公的一次总爆发，虽然仅仅持续了十二天，并被苏军的悍然入侵所镇压，但它却成为匈牙利民族的一次集体记忆，成为了改革的一面旗帜，也

为八十年代末的政治变革埋下了伏笔。

博物馆的地下室里就有一个名为“1956年革命”的展厅。这里陈列着一面当中被剪去苏式标记的匈牙利国旗、一辆当年的自行车、以及当时革命者们所使用的武器——一挺机枪和一瓶“莫洛托夫鸡尾酒”（自制燃烧瓶）。厅内还有数个显示屏在播放着当年革命的影像资料。

在1956年革命期间复出的改革派领导人纳吉·伊姆雷后来也被押送回国受审，并于1958年6月16日被处决。在博物馆的二楼有一个展厅，里面布置成法庭的模样，主席台上的大屏幕播放着当年对纳吉进行审判的时长近1小时的宣传片。当局显然是想说服人们，这是一次公开公正的审判。但位于展厅一侧墙壁上的一处设计却形象地戳破了这个谎言——那是一道虚掩着的暗门，往里一看，原来是一个小隔间，里面摆放着桌椅和电话，墙上还挂着拉科西的画像。原来，台上的审判只是个形式，最终的结果早已被当局决定好了，并通过这个通讯室传达给了负责审判的法官！事实上，因为缺乏对于司法独立的制度保障，1945年以后匈牙利“人民法院”的多数判决都无法逃脱类似的模式。在司法审判中，原来的“无罪推定”原则被如今的“有罪推定”所取代，现在不是检察官需要拿出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而是被告需要千方百计地证明自己的清白了。仅

是屈打成招的口供就可被当作充足的罪证，而不需提供任何实质的证据。该展厅的墙上陈列着当时司法系统的800多卷档案，内容涉及了当年的政治审讯、起诉、判决、上诉以及调查记录等等。因此，这个展厅的名字显得尤为直率——“被亵渎的司法”。

告别“恐怖屋”

除了上文提到的展馆之外，“恐怖屋”里的其他诸多展馆如“箭十字党大厅”、“苏联顾问办公室”、“强制农业征收”、“明曾蒂大主教”、“泪水大厅”等也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限于篇幅，这里无法做详细介绍了。

曾有一位匈牙利学者向笔者抱怨，说她不认为将纳粹和共产党政权放在一起展示是个好主意，因为它们拥有着如此不同的意识形态基础。但是笔者认为，一个政权或是政治领袖主张什么、以及做出了什么样的承诺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恐怕还是在于它具体做了什么、以及它所提供的一套制度安排在现实中又是否能够达到它当初所作的承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从两种政权身上看到的恰恰是如出一辙的对于基本公民权利如投票权、竞选权、享有正当审判程序的权利、自由言论权、自由迁徙权的漠视与践踏。以种族主义还是阶级斗争为口号，又有多大的差别呢？正如著名历史学家、华

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志华所指出的那样：当局建立“恐怖屋”的目的是为了监督和控制民众，这是极右和极左政权的共同特征之一，而真正文明、民主和现代化的社会应该反过来，是民众得以通过各种制度安排来对政府实行有效的监督和控制。

参观完整个博物馆，笔者回到一楼的大厅当中，这里矗立着一辆巨大的苏式坦克，在坦克的后面，是一堵高达三层楼的纪念墙，墙上密密麻麻地刻满了当年受害者们的照片。斯大林曾有名言曰：“死一个人是场悲剧，死100万人就是一个（统计）数字了。”但这面纪念墙却在告诉人们，每一位受害者都是一条

鲜活的生命，都拥有各自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与尊严。

走出博物馆的大门，和煦的阳光照在脸上，让人突然间有些恍惚，分不清地狱和人间，哪一个才更加真实。但我想，身后的这幢博物馆本身，就是帮助匈牙利民族远离“恐怖”的另一重保障吧！正如时任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多（Orbán Viktor）于2002年2月24日的“恐怖屋”开幕致辞上所说的那样：“我们如今将那些恐惧和仇恨都关进了这座大楼，因为我们希望它永远都不要再出现在我们未来的生活当中。是的，我们应当将它们关起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忘记这一切。” 



回港 肯特(美国)

《美洲黑白木刻》(苏林编,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00年6月)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鸣谢：季风书讯

合作媒体：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欢迎订阅，转载请注明出处和订阅信箱：shrbooks@gmail.com

文章和图片如果涉及版权问题，敬请来信告知。

独立阅读讨论区：<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